

數位人文視野下近代中國「新／舊」話語的 交鋒與激辯*

鄭文惠**、邱偉雲***

摘要

本文奠基在前人研究基礎與成果上，借用數位人文技術與方法，探勘近代中國思想轉型時期，大量以「新／舊」詞族——一套以關鍵詞叢表述的話語系統——所建構與再現的中國多元現代性樣態及其演化的發展過程。

本文首先擷取近代中國以「新／舊」為字首的巨量詞叢，並從這巨量詞叢在百年歷時性的新陳代謝軌跡中，發現「新／舊」話語交鋒

* 本文所引用之「新舊」一詞詞條內容，取自「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國立政治大學高教深耕「東亞文化傳統及其現代轉型」國際拔尖計畫（主持人：金觀濤、鄭文惠）進一步發展完善，並提供檢索服務，謹致謝忱。又，本文係科技部「觀念・話語・行動：數位視野下中國／臺灣多元現代性研究」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鄭文惠）項下子計畫——「新／舊」的激變與交鋒：中國現代性形成的數位人文研究（主持人：鄭文惠。NSC-104-2420-H-004-035-MY2，2015.8.1-2018.7.31）及山東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數字人文視野下近代中國多元現代性話語體系構建研究（2017TB0013）的部分成果。本文問題意識的提出是由作者二人共同討論得出，其後由邱偉雲將人文問題意識進行量化轉譯，進而計算出數據結果，後再由鄭文惠從數據線索出發，配合史料文獻進行細部閱讀分析，最後再由作者二人共同討論議定出結論。數位人文研究是由人文分析與數據計算所組成，作者二人分各職司工作又相互合作討論，最終完成本篇研究。另，謹向兩名匿名審查委員及編委所提供的寶貴建議致上深摯的謝意！

**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文學院「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華人文體性研究中心」副主任。

*** 現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系副研究員。

與激辯的七大主題：新舊社會、新舊政府、新舊思想、新舊道德、新舊勢力、新舊制度、新舊文學；接續再運用數位人文技術中的時間序列研究法，計算出「新／舊」話語交鋒與激辯之七大主題的時間向度數據，以揭示「新／舊」話語交鋒與激辯之七大主題在時間序列上的歷史意涵。最後，從「舊的代謝」、「新的失能」、「概念的『二重現代』轉化」三面向提出考察，藉以驗證、修正傳統人文學者定性研究的舊說，並提出巨觀視野下數位人文研究的新看法。

關鍵詞：新舊論爭、近代中國、多元現代性、數位人文、觀念史／概念史

一、緒論

有關近代中國「新／舊」概念的研究，前人已積累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如指出 1866 年張德彝（1847-1918）撰寫《航海述奇》等書之際，中西與新舊相互替代，尚無褒貶之意；自強洋務運動時期（1860-1895），朝野共同趨新，「新」指西藝器物，「舊」指中國道體，所開啟的中國早期現代化運動，係「以西為新」做為核心概念的經世實學，並未呈顯新舊交鋒的狀態；湖南新政（1895-1898）之際，新舊交鋒已與保教／保國議題連結；庚子事變（1899-1901）後，由於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意識到自身的未進化與西方的文明，新舊交鋒與善惡、是非、高下、進步、保守等概念相互連結，自此新舊話語的交鋒明顯具有價值判斷，也涵具了一定的概念意義，其中「善」與「進步」等概念內涵，均共同指涉有助國家富強、具有工具價值理念的學問德性；新文化運動階段（1915-1923）主張全盤西化，新舊交鋒相對於晚清朝向更多元的發展，或以科學／民主為新，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舊藝術與舊宗教、舊倫理與舊政治；或以評判態度為新；或以朝向進化為新；或以左為新，主張以社會主義與武力革命方式進行整體式的、根本解決的文明再造的造新去舊工程等。¹

而新舊概念的發展與交鋒又與事件緊密關係，如 1840 年代鴉片

¹ 羅志田，〈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歷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頁 117-132；羅志田，〈近代湖南區域文化與戊戌新舊之爭〉，《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頁 51-81；羅志田，〈新舊能否兩立：二十年代《小說月報》對於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歷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頁 9-28、189；羅志田，〈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王先明，〈近代「新學」的民族定位〉，《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257-284；王中江，〈「新舊」觀念的衍化及其文化選擇方式——從清末到「五四」〉，《近代中國思維方式演變的趨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 章，頁 320-345；丘為君，〈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年）。

戰爭推動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轉向於以大機器為生產手段的近代化工業，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促使儒家獨尊的文化一統格局受到西學衝擊而產生新學；² 1860 年代初期至 1890 年代中期，面對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開啟了中體西用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由於洋務運動開啟學習新事物、新制度及新觀念的正面性以及晚清之際外交的節節失利，原先慣常使用的「華夷」一詞逐漸轉向為中性的「中西」用語，為晚清「新／舊」概念的出現奠定了客觀現實基礎的功能；³ 1895 年甲午戰敗，清廷遭受沉重打擊，洋務運動黯然收場。但也因西方學科分科概念與學科制度的改革，促成如湖南地區的學政改變，從舊學轉向新學課士，由守舊轉而務求時務，中國知識人開始融通中西學科思維，開啟了以西學會通中學（經史之學），以中學整合西學的「新學」；⁴ 1898 年戊戌變法是新舊之分明顯確立的轉折象徵性事件，在戊戌變法前已頻繁出現新黨、舊黨等政治群體區辨與認同的詞彙，顯示新舊之分已基本確定；⁵ 1899-1901 年庚子事變，光緒帝（1871-1908）發佈諭旨，要求「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中西新舊又成敏感詞，涵具明顯的價值判斷和傾向性。1905 年廢除科舉，道統和治統疏離，「舊」的社會群體——「士」（道治合一）逐漸消失，「新」的社會群體——「知識人」（議政而未參政）出現，科舉廢除也促成新

² 王先明，〈近代「新學」的民族定位〉，《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論》，頁 257-284。

³ 陳旭麓，〈戊戌時期維新派的社會觀——群學〉，《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頁 161-175；王中江，〈「新舊」觀念的衍化及其文化選擇方式——從清末到「五四」〉，《近代中國思維方式演變的趨勢》，第 5 章，頁 320-345；羅志田，〈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

⁴ 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8-81；王先明，〈近代「新學」的民族定位〉，《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論》，頁 257-284；左玉河，〈晚清「古學復興」：中國舊學納入近代新知體系之嘗試〉，《史學月刊》2004 年第 9 期，頁 62-71。

⁵ 羅志田，〈思想觀念與社會角色的錯位：戊戌前後湖南新舊之爭再思——側重王先謙與葉德輝〉，《歷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頁 56-76；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頁 18-81。

舊交鋒；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中國知識人形成「一戰轉向論」，進而促使近代中國思想轉型，如 1916 年李大釗（1889-1927）提出「歐戰誕孕論」，歐戰表徵著「新生命」來臨前夕的醞釀，一戰使得中國知識人意識到西方並非一個整體，而是內部分裂，存在著衝突，從而促使「中西辨析」升溫，「新舊交鋒」逐漸淡化，往後更出現「左右分野」。如李大釗指出一戰終結了舊秩序（社會革命意義的資本主義政治社會體系的瓦解），開啟了新秩序（不只是狹義的政治革命意義的舊帝國主義的失敗與解體，而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在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下建立了植根於馬克思主義上的新政權。1915 年新文化運動，為近代中國「新舊」決裂的代表性事件分水嶺，新文化運動係最後一次顯著的新舊之爭，此後舊派已大致失語，而走向新與新戰。⁷

至於因事件引致新舊話語的交鋒而改變時人的心態，如晚清洋務運動之際，新舊派的分別，僅在解決當務之急的根本策略上的分歧，新舊之分不在思想與行為上，而是在群體身分認同上。另，由於「趨新」成為晚清上升性的社會變動（social mobility），具有自炫、牟利、弋名之用，因此部分守舊人士自許新派僅是避頑固之名以支持維新；甲午戰爭（1894-1895）與庚子事變後，由於文化立足點失位，而走向學習西方的「新的崇拜」的激進化心態；但問題在於雖然「崇新」推倒了舊學，然而新舊對立，崇新／守舊的循環往復，實質無法產生可接受的持續性價值觀，因而，社會文化一直處於新舊文化轉型的空窗期——一種虛空的文化失範的狀態中，人心無所適從。當時諸多知識人的話語行為呈現出複雜的矛盾心態。知識人「以西為新」，卻未能割斷與「舊」的多層次聯繫，戰勝「舊」的不是「完全的新」，

⁶ 羅志田，《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頁 1-17。

⁷ 以上參見羅志田，《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丘為君，《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

而是參雜「舊學」後的「新」，仍憑藉「舊」的功用以戰勝「舊」，顯示出新舊的詭論（paradoxical）；面對新舊雜陳，新舊的界限不明及矛盾與曖昧的狀態，新文化運動中出現了「新舊不容論」與「新舊調和論」兩種心態。產生新舊曖昧、矛盾之因，正如陳獨秀（1879-1942）、胡適（1891-1962）均點出係受文化惰性影響所致；⁸ 在文化惰性的批判浪潮之下，部分知識人主張新舊交鋒之中，新派旗幟必須鮮明，才能激起舊派的反抗與爭辯，進而彰顯出真理，使大眾從中抉擇出是非，而形成全盤反對論的心態與主張。可見近代中國百年以來新舊交鋒複雜而多變的心態與軌跡，誠如丘為君指出，有從模糊概念，到各種眾聲喧嘩意義下的聲明（statements），再到具有時代影響力的論述（discourses），最後成為世代的心態（mentalities）；⁹ 這一路朝向激烈化的發展趨勢，正因民初知識人正視與反思文化的惰性，因此唯有走向激烈化方能對治，正因如此才有激烈化的「崇新」心態的產生。

近代中國百年新舊交鋒的發展過程，大致可歸結出以下趨勢：其一，在「新」的概念上有從外在器用、制度朝向思想價值文化觀念的內在化趨勢；其二，在「舊」的概念上有從形上道體朝向形下語言文字與意識習慣的世俗化趨勢；其三，在「新／舊交鋒」中有從「相容」朝向「對抗」的激進化趨勢。藉由前人對近代中國新舊交鋒兼具深度與廣度的研究，不僅可掌握傳統微觀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可成為巨觀研究的基礎。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透過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視野，比對巨觀與微觀研究之不同及可相互發明之處，除藉以突出巨觀的文本探勘（text mining）研究與傳統人文研

⁸ 關於陳獨秀與胡適對社會與文化惰性的討論，參見陳獨秀，〈調和論與舊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頁116-118；胡適，〈編輯後記〉，《獨立評論》第142號（1935年3月17日），頁24。

⁹ 丘為君，《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頁335。

究相互對話的可能，並試圖提出在大數據時代下觀念史／概念史¹⁰由人文轉向數位人文研究的可能方案。不同於前人只著重於「新」的研究，本文運用數位技術與方法，立基於巨觀視野與遠讀（distant reading）¹¹方式，企圖對《新民叢報》、《民報》、《國粹學報》、《甲寅》、《新青年》、《嚮導》等近代重要文獻之新／舊詞族與概念進行文本探勘分析，以揭示中國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重要表徵。首先勾勒出近代中國新／舊史料中的高頻詞族，並聚焦在新／舊七個主要交鋒與激辯的詞族，分別是：新舊社會、新舊政府、新舊思想、新舊道德、新舊勢力、新舊制度、新舊文學；再透過新／舊七大交鋒與激辯之話語論述與修辭策略，分析近代中國思想轉型及社會文化的變遷歷程。

¹⁰ 有關概念史／觀念史理論的緣起、發展與內涵，以及數位人文研究轉向，可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 *Economy and Society* 11/4 (1982): 409-427；方維規，〈概念史八論——門顯學的理論與實踐及其爭議與影響〉，《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101-170；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二十一世紀》總第111期（2009年2月），頁124-131；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金觀濤、劉青峰，〈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55-84；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223-302。

¹¹ 所謂遠讀是指通過量化方法，對龐大文本中的類別因素、形式元素發展數據作出觀察與解釋。關於數位人文方法的遠讀能力，以及如何與細讀之間相互協作，可參見 Ted Underwood, *Why Literary Periods Mattered: Historical Contrast and the Prestige of English Stud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6；Matthew L. Jockers, *Macroanalysis: 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 History* (Urbana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3), 8；〔美〕戴安德（Anatoly Detwyler）著，姜文濤、趙薇譯，〈數字人文作為一種方法：西方研究現狀及展望〉，《山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11期，頁26-33。

二、巨觀與遠讀：「新／舊」詞族結構與比較

五四時期(1915-1926)「新／舊」概念的意指範圍具有泛化現象，西方的或提倡的往往名為「新」，如新文學、新詩、新道德、新教育、新青年、新女性、新思潮、新思想、新政、新生活、新時代等；而本土原有的或反對或固守的名為「舊」，如舊文學、舊詩、舊道德、舊教育、舊青年、舊女性、舊思潮、舊思想、舊政、舊生活、舊時代等。這些新／舊詞彙所涵具的概念意義，代表的正是近代知識人想要追求／推翻的對象。¹² 作為研究者有沒有可能勾勒出近代中國百年以來的「新／舊」詞族？且對「新／舊」詞族進行排序，進而揭示近代中國知識人最想追求／推翻的對象或概念為何？若依傳統微觀的定性研究，是無法窮盡近代史料並給出上述提問的答案，即使是進行「新／舊」詞族的討論，往往也是研究者個人選精與輯粹的結果而缺乏全面性的比較，但透過現今已建置的近代數位文獻及數位探勘方法，則開啟了新的可能。從數位人文視野切入，可相對的更為全面的進行研究，同時藉由數位人文技術與方法，也開啟了歷史研究或觀念史／概念史新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路徑，而得能與傳統人文研究相互發明，甚至能超越人力所不及之處。

本文以「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¹³ 中的新

¹² 王中江，〈「新舊」觀念的衍化及其文化選擇方式——從清末到「五四」〉，《近代中國思維方式演變的趨勢》，第5章，頁331-332。

¹³ 本文所引用之「新／舊」一詞詞條內容，取自「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國立政治大學高教深耕「東亞文化傳統及其現代轉型」國際拔尖計畫(主持人：金觀濤、鄭文惠)進一步發展完善，並提供檢索服務，謹致謝忱。關於數據庫中所收集的資料，請參見金觀濤、劉青峰，〈附錄一「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文獻目錄〉，《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463-477。

／舊語料為研究對象，從資料驅動（data-driven）視野出發，¹⁴ 勾勒並分析近代中國新／舊之觀念藉由哪些詞族建構與再現？新／舊詞族在近代中國的重要性排序及交鋒主題與激辯內涵為何？這些問題唯有從數位人文視野出發，方能被提出與進行回應，而若能挖掘出上述問題的答案，當能深廣近代中國新／舊觀念之發展脈絡及其表徵社會文化的變遷。以下即分別論析近代中國百年間新／舊關鍵詞族的數據結構與歷史意涵。

（一）「新」的詞族結構

為找出近代中國百年間「新」的詞族結構及其詞頻排序，本文進行數位人文研究步驟如下：（一）先以「新」字為檢索詞，從數據庫中下載以「新」字為中心，前後各 10 字，總計每條語料為 21 字的視窗單元語料，¹⁵ 共有 108,757 條語料，總字數約為 2,268,990 字。（二）使用 n-gram 程式進行分詞，擷取以「新」作為前詞綴的三至五字詞；¹⁶（三）將計算後所有以「新」作為前詞綴的三至五字準詞

¹⁴ 所謂資料驅動是指以資料在先、模式在後或是無模式思考的方式進行資料採擷與分析工作，有別於過去理論驅動下，先定義關係模式，而後才將資料依照關係模式強制轉換後放入資料庫，藉以完成資料採擷與分析工作的方式。參見朝樂門、邢春曉、張勇，〈數據科學研究的現狀與趨勢〉，《計算機科學》2018 年第 1 期，頁 6。

¹⁵ 基本上，當視窗單元越小時，共現概念詞與核心概念詞在語義上會更為密切，因此本文以前後 20 字作為視窗單元，藉以觀察與「新」最為密切的共現概念。不過，因應不同文體與不同議題，可使用不同視窗單元進行研究，視窗單元的設定具有開放性。

¹⁶ 本文首先運用 n-gram 作為斷詞方法，斷出二字到五字詞，而後取前詞綴為「新」與「舊」字的二字詞到五字詞進行人工過濾，得出準確的「新」與「舊」的詞表。而在人工過濾關鍵詞時，選取 v+n 模式，如新聞紙、新金山等名詞不選。另，僅取三至五字詞，主要考量近代在討論新舊問題時，基本上更多是以「新舊」的詞綴加上一個雙音節詞，因此研究三至五字詞在某個程度已能呈現出新舊論爭的結構與樣貌。且三至五字詞明確，相對正確，而二字詞有太多雜訊，部分需進行資料清理工作後才能分析，如新學一詞詞頻中包含新學校，但兩者概念不同，因此對於二字詞本文先暫且不論，有待日後再作處理。

族與詞頻結果轉為 excel 檔案，以詞頻超過 100 次以上者為待選詞，進行人工過濾後製表，得出「新」之詞族表，如表一；（四）再以表一資料為基礎，運用網路視覺化軟體繪製成圖一。

表一：「新」之詞族表

序號	關鍵詞	詞頻	序號	關鍵詞	詞頻	序號	關鍵詞	詞頻
1	新政府	961	16	新生活	230	31	新知識	121
2	新青年	671	17	新時代	225	32	新天地	117
3	新思想	561	18	新發明	223	33	新學說	117
4	新世界	477	19	新事業	212	34	新法律	117
5	新文學	415	20	新大陸	185	35	新世紀	114
6	新內閣	388	21	新名詞	178	36	新文明	113
7	新社會	379	22	新制度	169	37	新人物	113
8	新紀元	343	23	新思潮	168	38	新福建	110
9	新中國	322	24	新組織	158	39	新理想	108
10	新經濟	281	25	新勢力	154	40	新政治	108
11	新道德	278	26	新憲法	147	41	新報館	108
12	新國家	267	27	新條約	141	42	新政策	107
13	新文化	254	28	新銀行	137	43	新國會	105
14	新教育	254	29	新宗教	132	44	新國家主義	104
15	新經濟政策	240	30	新智識	125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列表

從上表可看出近代中國「新」之詞族的詞頻重要性排序，再以表一資料為基礎，運用網路視覺化軟體繪製成圖一。

表二：近代中國「新」之詞族類型分類表

類型	關鍵詞
制度組織類	新政府、新內閣、新經濟、新教育、新經濟政策、新制度、新組織、新憲法、新條約、新銀行、新法律、新政治、新報館、新政策、新國會、新國家主義
時間空間類	新紀元、新時代、新世紀、新世界、新社會、新中國、新國家、 ¹⁷ 新大陸、新天地、新福建
思想觀念類	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潮、新宗教、新智識、新知識、新文明、新理想
其他類	新青年、新文學、新生活、新發明、新事業、新名詞、新勢力、新學說、新人物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列表

表二中，近代中國「新」之詞族，是以「制度組織類」、「時間空間類」、「思想觀念類」及「其他類」等向度建構而成的觀念結構，其中又以「制度組織類」為「新的崇拜」的重要聚焦場域。

（二）「舊」的詞族結構

針對近代中國百年的「舊」的詞族結構及其詞頻排序，本文進行數位人文研究步驟如下：（一）先以「舊」字為檢索詞，從數據庫中下載以「舊」字為中心，前後各 10 字，總計每條語料為 21 字的視窗單元語料，共有 49,276 條語料，總字數約為 1,047,478 字。（二）使用 n-gram 程式分詞，擷取以「舊」作為前詞綴的三至五字詞。（三）將

¹⁷ 「社會」意指社會中個人所組成的群體空間；「國家」係屬一定空間範圍內群體所形成的集體共同體形式。為便於分析，本文列「新社會」、「新國家」為「時間空間類」，而非「制度組織類」。

所有以「舊」作為前詞綴的三至五字準詞族與詞頻結果轉為 excel 檔，以詞頻超過 100 次以上者為待選詞，進行人工過濾後製表，得出「舊」之詞族表，如表三。(四) 再以表三資料為基礎，運用網路視覺化軟體繪製成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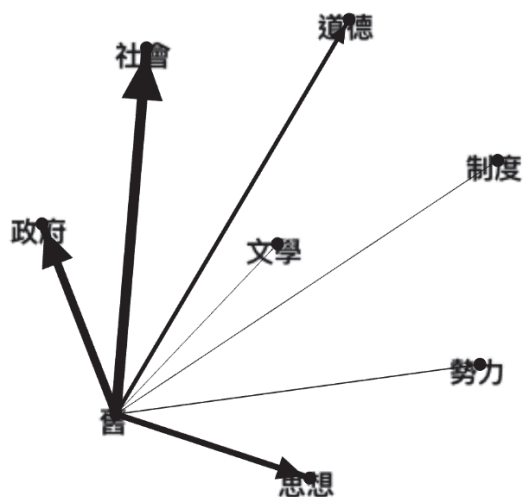
表三：「舊」之詞族表

序號	關鍵詞	詞頻
1	舊社會	386
2	舊政府	326
3	舊思想	258
4	舊道德	217
5	舊勢力	144
6	舊制度	136
7	舊文學	120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列表¹⁸

從表三中可看出近代中國「舊」之詞族的詞頻重要性排序，本文再用網路視覺化軟體呈現表三的資料資訊，繪製成圖二。

¹⁸ 此處七個關鍵詞的詞頻，已減去新舊社會、新舊政府、新舊思想、新舊道德、新舊勢力、新舊制度、新舊文學等詞的詞頻，因「新」的關鍵詞中並未加入上述七個關鍵詞的詞頻數量，故予以減去，如此兩處的資料基礎一致。



圖二：「舊」之詞族圖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從圖二可見，數據庫中以「舊」作為前詞綴的三字至五字詞族中，以「舊社會」一詞最多，其次依序為舊政府、舊思想、舊道德、舊勢力、舊制度、舊文學。這些「舊」之詞族，本文視為近代中國「舊」之觀念的語言再現結構，可分為四大類型，如表四。

表四：近代中國「舊」之詞族類型分類表

類型	關鍵詞
制度組織類	舊政府、舊制度
時間空間類	舊社會
思想觀念類	舊思想、舊道德
其他類	舊勢力、舊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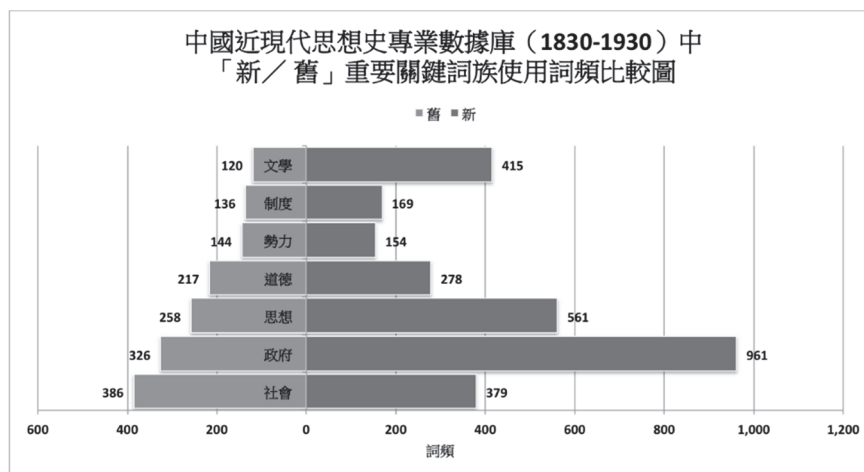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列表

由表四可見，近代中國「舊」之詞族，仍是以「制度組織類」、「時間空間類」、「思想觀念類」及「其他類」等向度建構而成的觀念結構，但與「新」的詞族再現結構不同有三：其一，「舊」的詞族普遍分佈於不同類型中，不似「新」的詞族更著重於「制度組織類」；其二，「舊」的詞族沒有時間類關鍵詞，只有空間類的「舊社會」一詞，這表徵著時間性關鍵詞主要表現在現代性與進化論上，因而只出現在「新」的詞族，而未出現在「舊」的詞族；其三，不少重要的「新」的詞族概念，並未在「舊」的詞族中具有同等重要性，如新世界（477）／舊世界（81）、新紀元（343）／舊紀元（3）、新經濟（281）／舊經濟（17）、新文化（254）／舊文化（28）、新教育（254）／舊教育（60）、新文明（113）／舊文明（30）等，顯示出「新／舊」詞族並非同構，而是有各自聚焦的重點議題。

（三）「新／舊」詞族的相對與特出

透過數位人文技術勾勒出近代中國百年的「新／舊」詞族數據結構後，本文再對表一與表三等詞頻超過 100 次以上的「新／舊」詞族數據結構進行比較，如圖三。

圖三係對比「新／舊」七個重要關鍵詞，將新／舊關鍵詞的詞頻附加於上。從中可看出重要訊息與線索：其一，處於平均論述而呈現出同等的新／舊交鋒力道的，有社會、道德、制度、勢力四個面向，這意謂著在制度、道德、社會、勢力四個面向上，新／舊交鋒與激辯的論述相當頑強，由於在舊的不好，所以追新的思維框架下，以轉化傳統為新；甚或特別樹立出舊的對象予以攻擊，以破壞傳統為新；其二，新／舊交鋒與激辯中，新的論述力道勝於舊者，有政府、思想、文學三面向，意謂著這三面向是在新的很好，所以去舊的思維框架下，主要在於提倡「新」，並不特別著重於推翻「舊」。



圖三：「新／舊」重要關鍵詞族使用詞頻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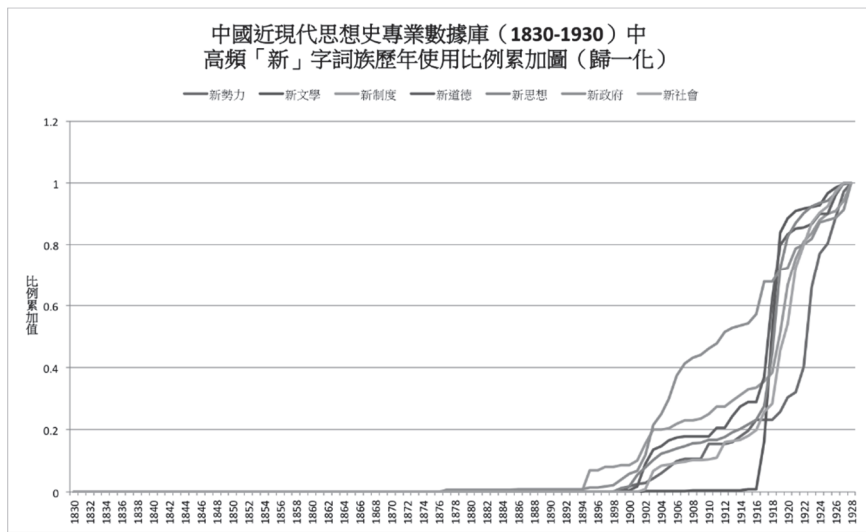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三、微觀與精讀：新／舊交鋒與激辯的發展軌跡與歷史意涵

前述透過對巨量史料的層層計算與統計歸納，凝聚出近代中國新／舊交鋒與激辯的七大主題：新舊社會、新舊政府、新舊思想、新舊道德、新舊勢力、新舊制度、新舊文學。為揭示近代中國百年間新／舊交鋒與激辯七大主題在時間序列上的歷史意涵，以下接續運用時間序列研究法，計算新／舊交鋒與激辯七大主題的時間向度數據，步驟如下：其一，計算新／舊交鋒與激辯七大主題關鍵詞在數據庫中歷年的詞頻數量；其二以「CUSUM」方法¹⁹ 計算新／舊交鋒與激辯七大

¹⁹ 「CUSUM」是一種統計方法，全稱為「Cumulative sum control chart」，但本文所使用之「CUSUM」全稱為「Cumulative proportion chart over period」，主要是用在進行觀念詞頻成長比例的歷時性變化觀察之上。「CUSUM」研究中的橫軸為時間，故稱為「Cumulative proportion chart over period」。「CUSUM」圖呈現的是累積相對頻次，其作法是將一般頻次，

主題關鍵詞在數據庫中歷年的使用比例累加值後，繪成圖四、五，藉以進一步揭示新／舊交鋒與激辯七大主題的歷時性時間發展軌跡及其歷史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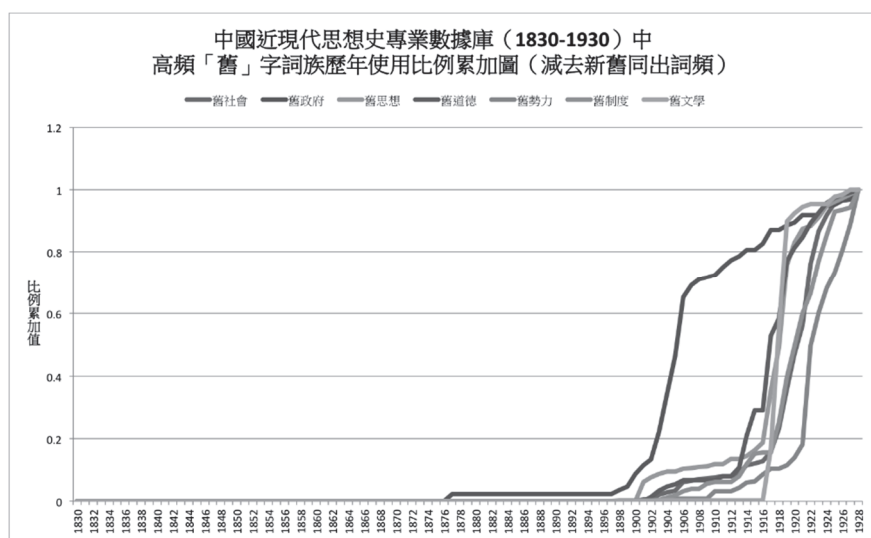
圖四：高頻「新」字詞族歷年使用比例累加圖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從圖四可見「新」的七個重要關鍵詞在時間向度上的數據結構信息，呈現出如下發展趨勢：其一，庚子事變後首次提出「新政府」與「新制度」、「新道德」、「新勢力」、「新思想」、「新社會」的論述；尤

按時間累加其頻率的比例而成。「CUSUM」圖線條只上不下，此做法可減少頻次圖的線條交錯，使圖表在呈現時比一般頻次圖簡潔，便利於人文研究者進行讀圖分析。「CUSUM」圖是已被大量利用的圖表形式與計算方法，有興趣者可參見 Douglas G. Altman, *Practical Statistics for Medical Research* (Boca Raton: Taylor & Francis, 1991), 29-31。關於「CUSUM」分析技術的人文運用，已有研究成果並已證明此方法之有效性，如鄭文惠、邱偉雲，〈從「概念」到「概念群」：《新民叢報》「國家」與「教育」觀念的互動與形塑〉，《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0期（2016年6月），頁37-102。

其是「新政府」概念在 1899-1901 年庚子事變後大量湧現，表示近代中國在政治思想領域中是先進行政治現代化論述。近代中國最早「新」的論述是為了救亡圖存，而進行政府改革的政治現代化行動；其二，「新道德」、「新勢力」、「新思想」、「新社會」等詞彙概念與「新政府」詞彙概念一樣皆於庚子事變後湧現；不同的是，「新制度」、「新道德」、「新勢力」、「新思想」、「新社會」等詞彙在 1900-1903 年與 1919 年後各有一次的湧現，這反映出「制度」、「道德」、「勢力」、「思想」、「社會」等面向在晚清與民初各有一次集中論述，呈現出「二重現代」轉化的歷史軌跡，如近代中國經歷了晚清集體道德與民初個人道德兩次道德概念之現代化轉型的歷程；其三，新文化運動後再次提出「新制度」、「新道德」、「新勢力」、「新思想」、「新社會」，並強化了「新文學」的論述；尤其是「新文學」概念在 1917 年後高度湧現，顯示出文學現代化是在政治現代化、思想道德與社會現代化之後的第三階段行動，而文學現代化處於最後湧現階段，關鍵在於共和亂象後，知識人終於意識到要改變思想唯有透過文學革命才能達致，故而推動文學現代化的文化再造工程。綜上，透過巨觀視野的數位人文遠讀方式，可勾勒出近代中國「追新行動」的兩個階段：其一，庚子事變後以「新政府」為核心，並追求「新制度」、「新道德」、「新勢力」、「新思想」、「新社會」，進行第一重現代化行動；其二，「新制度」、「新道德」、「新勢力」、「新思想」、「新社會」的論述在晚清微微起伏後稍微停滯，直到新文化運動開始後才大幅增長，這表示「新」的論述雖起自晚清，但成長茁壯於民初。新文化運動後以「新文學」為核心，並追求「新制度」、「新道德」、「新勢力」、「新思想」、「新社會」二重現代化行動。上述的結論與前人長期微觀研究若合符節，可見透過巨量資料的定量研究可驗證前人微觀定性研究的適切性。



圖五：高頻「舊」字詞族歷年使用比例累加圖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從圖五可見「舊」的七個重要關鍵詞在時間向度上的數據結構，呈現出如下發展趨勢：其一，「舊政府」如同「新政府」在 1899-1901 年庚子事變後具有較高的湧現，主要在於晚清知識人提出「舊政府」的問題，同時追求「新政府」的建立，由於意識到「舊的不好」，所以「追新」，因而提出「新政府」時是以「舊政府」作為對比；其二，舊道德、舊思想、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等詞彙概念是在 1915 年前後才大幅湧現，與新道德、新思想、新社會、新制度、新勢力的論述同步發展，但在晚清之際卻未明顯同步發展，這表示晚清知識人並未多談「舊」的「道德」、「思想」、「社會」、「制度」、「勢力」，並未真正意識到「舊」的不好，而是在「以轉化傳統為新」的思維框架下提出新道德、新思想、新社會、新制度、新勢力的論述。迨至民初知識人發現即使經過「政府」現代化歷程與「道德」、「思想」、「社會」、「制

度」、「勢力」第一重現代化行動後，仍無法促使中國富強，才自覺意識到不推翻舊道德、舊思想、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則無法建立新道德、新思想、新社會、新制度、新勢力；因而，開啟了對舊道德、舊思想、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的攻擊論述，同步也提出新道德、新思想、新社會、新制度、新勢力的二重現代化論述與行動。正因民初有別於晚清之際新／舊相容的曖昧、矛盾，故而展現出新舊不容——以破壞傳統為新——的思維與行動，「舊道德」、「舊思想」、「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詞彙概念才在民初之後湧現；其三，「舊文學」與「新文學」詞彙概念在 1917 年後同步湧現，顯示出對於「文學現代化」的思考，是處於「舊的不好」，所以「追新」的「以破壞傳統為新」的思維框架中，因此提出「舊文學」問題，同時建立「新文學」的追求理想。綜上，透過巨觀視野的數位人文遠讀方式，可勾勒出近代中國「破舊行動」的三個階段：其一，1899-1901 年庚子事變前後破除「舊政府」；其二，辛亥革命（1911-1912）後，「舊道德」、「舊思想」、「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論述才被大幅提出，顯見辛亥革命之後破除「舊道德」、「舊思想」、「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之勢；其三，新文化運動後開始主張破除「舊文學」。

綜上可見「舊」的論述不同於「新」在晚清尚有一段湧現歷程，「舊」的論述主要是在民初之後才被大量使用，這表示「舊」的論述主要緣起並成長茁壯於民初，晚清階段並未大量樹立「舊」的敵人並加以攻擊之，而這也符合前人指出晚清之際以「轉化傳統」為「新」，民初之際以「破壞傳統」為「新」的觀察。

以上本文先從數據庫中七個重要新／舊關鍵詞的時間序列數據結構，進行巨觀的數位人文分析；接續，本文將運用微觀定性研究方法，更為詳細的從文獻語料中，進一步的揭示近代中國新／舊交鋒與激辯的七大主題內涵，比較每一組新／舊交鋒與激辯主題關鍵詞的歷年使用頻度比例累加情況，進而歸納出新／舊交鋒與激辯七大主題發

展的四種類型：一，先同步交鋒；二，後同步交鋒；三，先後同步交鋒；四，同步交鋒。這四種類型分別具有不同的思想發展脈絡，代表著不同的歷史意涵。

（一）先同步交鋒：政府

新／舊交鋒與激辯主題發展的第一種類型為「先同步交鋒」，主要以「政府」概念為主。

中國傳統「政府」一詞所指涉的意涵²⁰ 與近代以來「政府」概念有其共通性，均指與政治有關的組織機關，但近代以來「政府」概念為國家統治機關的總稱，係近代現代化國家構成要素之一，凡具有制定法律及執行法律之權力的政治組織稱為「政府」。因而，古今「政府」一詞，實質上存在著更大的殊異性，最大不同點即在於民族國家觀念的有無，近代以來的「政府」權力來自於國家，而古代「政府」權力來自於君王。因而，西方「政府」概念在近代傳入中國後，也須經由轉化才能為中國人所理解。

正因「政府」概念古今的差異，故晚清知識人以民族國家觀念為核心，重新定義「政府」，如 1902 年磬心（？-？）〈中國新教育案〉謂：

一曰明政府與國家之別。蓋國家者，公權之所生，其組織為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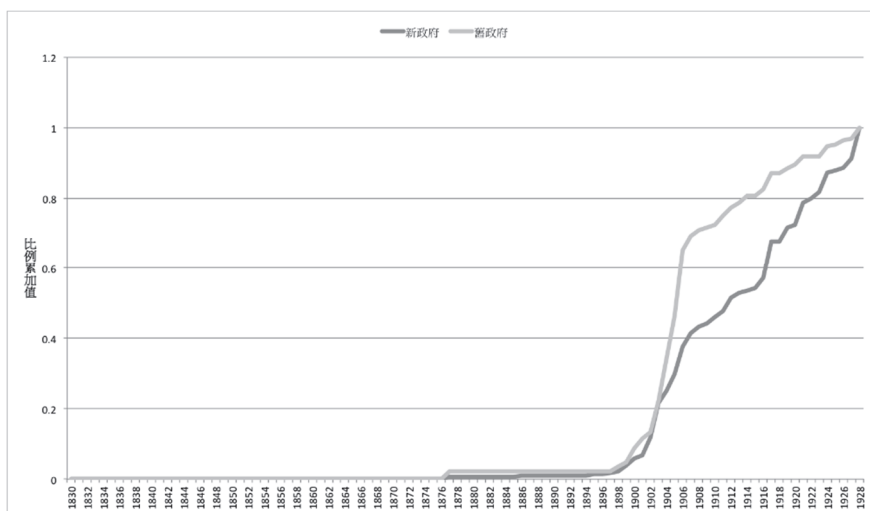
²⁰ 就二十四史而言，「政府」一詞最早出現於《北史·文苑·王褒》：「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即都鄢郢。」見〔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冊 9，卷 83，頁 2792。又，《資治通鑑·卷二一五·唐紀三十一·玄宗天寶二年》：「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政府」一詞，係指唐宋時宰相處理政務的地方，見〔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冊 11，頁 6857。

體；政府者，公權之所集，其位置僅居全體之一部耳。故必所集之權一出于公，然後對外而有代表之資格，在內而成統治之機關。不然，則所謂政府者，政府之政府耳，于國家無與也。不寧惟是，即使政府而真為國家之政府矣，而政府之力有限，國家之力無窮，政府者恃國家之擁護而不可須臾離者也。²¹

政府與國家為一體，屬國家的一部分，需依恃國家的擁護與力量，對外有代表國家之資格，對內則為執行公權的統治機關。但文中對「國家」與「政府」概念進行甄別，一方面可見時人對於「政府」概念仍無法有很好的掌握；一方面《新民叢報》刊文目的，係配合該刊的立憲派立場，立憲派認為「大清」即「中國」即「國家」，因而主張區分「國家」與「政府」。主要目的在於一旦發生問題，可將錯誤歸結於政府，僅指責政府，而與國家無礙。此一論述框架，能使立憲派有效面對革命派「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言論攻擊。由於立憲派認為「大清」是「中國」是「國家」，為維護「大清」，國家自然不存在著問題，有的僅是「政府」的問題，故革命派應該「革政府」而非「革國家」（大清），可見「政府」概念在晚清因著不同的政治立場自有其不同論述的重要功能。本文嘗試從巨觀視野及遠讀資料結構出發，與前述的定性分析進行對話與補充，結合前述圖四、五的「新／舊政府」的歷年比例累加值曲線，繪製成圖六。

從圖六可見，新／舊政府概念自 1898 年後開始同步交鋒，但早期有不少「新政府」係指西方外國的新政府，而非用以討論中國內部的政府問題。1900-1903 年新／舊政府概念同步湧現，轉而討論中國內部政府問題。如 1900 年〈記橫濱華商會議事〉指出庚子事變後，西方及維新派人士認為應當負責的是西太后慈禧（1835-1908）與北京

²¹ 磬心，〈中國新教育案〉，《新民叢報》第 5 號（1902 年 4 月 8 日），頁 53。



圖六：「新／舊政府」關鍵詞歷年使用詞頻比例累加圖²²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政府，而希望光緒帝能重新復政親政，為中國成立「新政府」；²³ 又如 1900 年〈致各埠保皇會公函〉指出應打倒庇護拳匪的「偽政府」，而於上海設立國會，預開「新政府」。²⁴ 可見庚子事變後，「新政府」一詞為維新派所使用，相對立者是「北京政府／偽政府」，而非「舊政府」。之後，立憲派也提「新政府」，但卻未提「舊政府」，因一旦提出「舊政府」即會自動產生負面價值判斷而具有攻擊性；作為保皇立憲派只能提「新政府」，「新政府」意味著民族國家觀念下的政府，亦即權力來自於國家的政府。立憲派避免營造新／舊政府的對立，而革命派卻強調新／舊政府的對立，因為樹立「舊政府」為話語交鋒之域，

²² 已減去新舊共出詞頻。

²³ 〈記橫濱華商會議事〉，《清議報》，1900 年 7 月 7 日，收入梁啟超、馮鏡如等編輯，《清議報》（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橫濱清議報館），冊 7，第五十冊，頁 3277-3278。

²⁴ 康有為著，湯志鈞編，〈致各埠保皇會公函〉，《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冊上，卷 2，頁 413-414。

能使革命派的政治革命有明確的攻擊對象，而能凝聚革命力量。故革命論式的新／舊政府的提出，係從革命陣營而起。如 1903 年〈新政府之建設〉指出中國若想不被帝國侵略主義者攻擊，就必須推翻專制政體的「舊政府」，建設共和政體的「新政府」，如此才能組織民族國家，對抗帝國侵略主義者，²⁵ 而 1906 年〈烈士吳樾君意見書〉也指出「舊政府」是滿清異族寄生的政府。²⁶

綜上可見，新／舊政府的交鋒論述，確實為革命陣營所喜用，而立憲陣營則盡量避免使用，此與其各自政治立場與想保護／革命的對象有密切關係。近代中國「政府」概念中的新／舊交鋒，實質上「新」在立憲派是指「君主立憲」，革命派是指「共和政體」；而「舊」在革命派是指「專制政體」，立憲派主要是在反駁革命派新／舊政府論時才被動的提出「舊政府」概念。因此，新／舊政府的交鋒，主要是「專制政體」與「共和政體」之激辯。從圖六可見，1904 年之後新政府概念繼續湧現，而舊政府概念則相對隱退，這或許因 1904 年之後，立憲陣營行動者加大了「新政府改革論」，藉以凌壓革命陣營的「舊政府革命論」，因此「新政府」使用多於「舊政府」一詞，這也表示在 1904 年之際立憲派確實意識到滿清政府面臨某種重大危機，故才須加強「新政府改革論」的力道。

（二）後同步交鋒：制度、勢力、道德、社會

新／舊交鋒與激辯主題發展的第二種類型為「後同步交鋒」，此一類型含括制度、勢力、道德、社會四個面向。

²⁵ 漢駒，〈新政府之建設〉，《江蘇》第 5 期（1903 年 8 月 23 日），頁 17-33。

²⁶ 吳樾君，〈烈士吳樾君意見書〉，《民報》第 3 號（1906 年 4 月 5 日），頁 1-9。

1. 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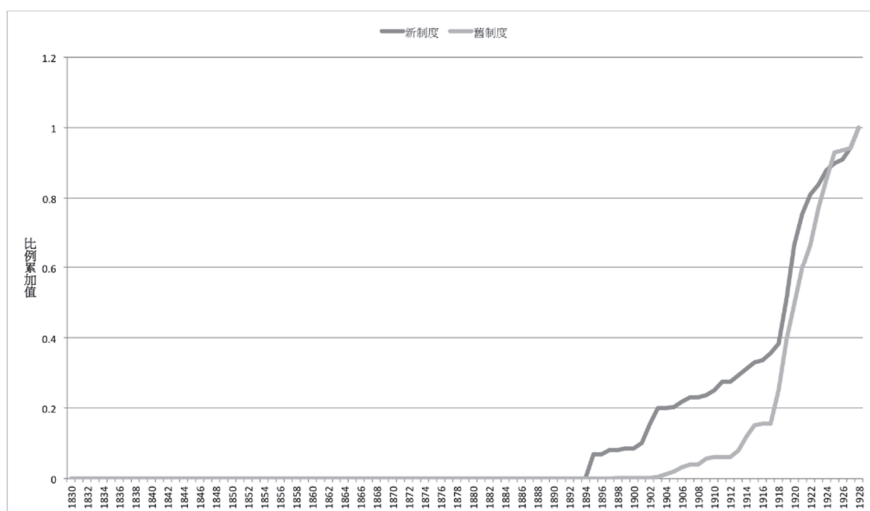
中國傳統「制度」概念²⁷與西方最大的差異，在於「制度」係由先王或聖人所制定，背後有一套根本的道義內蘊，蘊含著「禮制」理想的社會規範，因此中國的「制度」重要的是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才得以顯現背後的「制度精神」，有精神才能成「制度」，若無精神只能視為「法術」。²⁸為掌握近代中國面臨社會文化的急劇轉型，「制度」概念連結上新／舊論式，所涵具的歷史意涵、所承載的社會意識、所呈顯的社會變遷，及新／舊制度交鋒的發展軌跡，本文嘗試從巨觀視野及遠讀資料結構出發，與前述的定性分析進行對話與補充，結合前述圖四、五中的「新／舊制度」的歷年比例累加值曲線，繪製如圖七。

從圖七可見「新制度」一詞的使用起自於 1895 年後，基本上直至 1904 年與「舊制度」一詞開始交鋒之前，「新制度」一詞主要為立憲派使用，指稱君主立憲與民族國家視野下的「新制度」，而與「新民」、「新政府」、「新國家」一起出現，如 1902 年〈新民說〉謂：「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²⁹由於立憲派主張「改革論式」的「新」，因而並未與「舊制度」交鋒而出。

²⁷ 中國自古即存在著「制度」概念，如《荀子·儒效》謂：「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制度」意指經制定而為大家共同遵守認同的辦事準則，並以法度、規範、規則、習慣為制度的核心內涵。參〔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冊上，卷 4，頁 138；倪德襄，〈制度概念釋義〉，《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6 期，頁 589-592。

²⁸ 凌鵬，〈中國傳統「制度」概念中的「制度精神」與「史實現象」——以西周「世卿制度」為例〉，《社會發展研究》2016 年第 3 期，頁 86-88。

²⁹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一〉，《新民叢報》第 1 號（1902 年 2 月 8 日），頁 1-10。



圖七：「新／舊制度」關鍵詞歷年使用詞頻比例累加圖³⁰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到 1904 年後陸續有「舊制度」一詞的使用，其中與中國相關者，是以君主與政府一體不可分以指稱中國的「舊制度」，不過使用量很少，基本上新／舊制度並未真正激烈交鋒。如梁啟超（1873-1929）1906 年以「現政府」指稱滿清政府，並批評滿清政府逮捕革命黨人，實乃激起革命黨的意志而更生事端，其中所言「舊制度」，是指亟須去除的「君主專制政體」；由於過去政治腐敗的實況仍深印人民心中，因此君主與政府一體不分之「君主專制政體」的「舊制度」，係需被去除的負面概念與體制。³¹

雖然晚清階段已出現新／舊制度的論述，但並非呈顯為交鋒狀態，迨至新文化運動時期，1917 年後「舊制度」先湧現，而後「新制

³⁰ 已減去新舊共出詞頻。

³¹ 飲冰（梁啟超），〈現政府與革命黨（附記俄羅斯現政府與革命黨）〉，《新民叢報》第 4 年第 17 號（原第 89 號）（1906 年 10 月 18 日），頁 23-34。

度」跟上，在 1918 年同步交鋒。1919 年〈社會改制問題〉提及當時社會上有批評舊制度與鼓吹新制度的趨勢；³² 1919 年李大釗所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錄《晨報》）〉，從社會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出發，指出某一社會組織妨礙該社會經濟發達，同時又產製出新社會組織的種種必要條件，迨條件成熟後，舊制度才會滅亡，而產生新制度，這就是社會革命中新／舊制度相互取代的關鍵之處；³³ 1920 年〈什麼是革命的最好方法〉認為新／舊制度並非二元對立，二者會相互融攝，革命只能破壞舊制度的一部分，而遺留下來的舊制度會有意無意成為新制度的基礎，假使建設新的沒有一致的主張，舊的就會反動，而這正是復古運動的緣由。³⁴ 以上立論雖都提及新／舊制度，但未明白指出何謂新舊制度。

迨至 1920 年〈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在對「新文化」定義時，才提揭出「新制度」的內涵。作者認為「動／互助／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平民主義」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唯有從「靜／競爭／家族本位／軍國主義／貴族主義」轉向於「動／互助／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平民主義」，才能產生新教育、新學術、新文藝、新道德與新制度。³⁵「新制度」概念，與「動／互助／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平民主義」等精神內涵息息相關。1920 年張崧年（1893-1986）翻譯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民主與革命：續前〉，指出資本主義已經不容於世界，文化遺產已非資本制度所能保存，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保全文化，因此「舊制度」是不能保存了，反對者的反對只會讓「新制度」喪失許多價值。³⁶ 羅素指出的「舊制度」是指

³² 陳達材，〈社會改制問題〉，《新潮》第 2 卷第 1 號（1919 年 10 月 30 日），頁 23-28。

³³ 〔日〕河上肇著，淵泉（李大釗）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錄《晨報》）〉，《新青年》第 6 卷第 5 號（1919 年 5 月 15 日），頁 509-516。

³⁴ 余家菊，〈什麼是革命的最好方法〉，《少年中國》第 2 卷第 1 期（1920 年 7 月），頁 35-40。

³⁵ 陳啓天，〈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國》第 2 卷第 2 期（1920 年 8 月），頁 2-5。

³⁶ 〔英〕羅素著，張崧年（張申府）譯，〈民主與革命：續前〉，《新青年》第 8 卷第 3 號（1920

資本主義制度，而「新制度」是指社會主義制度，《新青年》翻譯了羅素該文，明顯肯定其主張。

從圖七可見晚清之際，「新制度」係「改革論式」而非「革命論式」的概念。改革論式，只揭櫫「新制度」以進行改革；革命論式則以「舊制度」作為對立論述，而有新／舊的激辯與交鋒。故如立憲派梁啟超雖曾提出「舊制度」以對應君主與政府一體不分的制度，表示其對「君主專制政體」的革命之意，但更多的是只談及「新制度」。然至民初階段，「新制度」的「新」，已從「君主立憲」轉向了涵具「動／互助／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平民主義」真精神的「社會主義」制度，相對大量的以「舊制度」作為對立論述，藉以凸顯「新制度」的正當性與必要性與革命的急切性與激進性。可見，近代中國知識人在「制度」層面上，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已然是二元對立的「革命」論式。

2. 勢力

傳統「勢力」³⁷與近代「勢力」一詞指涉的概念具有同質性，並未有太大改變。然而伴隨著近代中國面對西方霸權侵略的特殊語境，「勢力」概念的現代性展現，加上天演進化論思想，形成「論勢不論理」的思維框架，促使近代中國從以倫理道德為中心轉向於以國力強弱為標準的文明優劣觀，由「王道」轉向「霸道」，以「勢」為主的「霸道」成為中心，使文明與富強畫上等號。³⁸這一新型的富強文明

年11月1日)，頁1-6。

³⁷ 「勢力」一詞是中國傳統既有的詞彙與概念，意為大人物的權力、威勢，如《漢書·藝文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見〔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冊2，卷30，頁1715；另外一意指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力量，如《大宋宣和遺事·貞集》：「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內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見〔南宋〕作者不詳，黎烈文標點，《大宋宣和遺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頁24。

³⁸ 段煉，《世俗時代的意義探詢——五四啟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觀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12

觀，係以「勢力」為標準的「道」（霸道），而有別於傳統以「倫理道德」為標準的「道」（王道），近代中國所開展的「勢力新世界」實質已迥別於傳統的「禮義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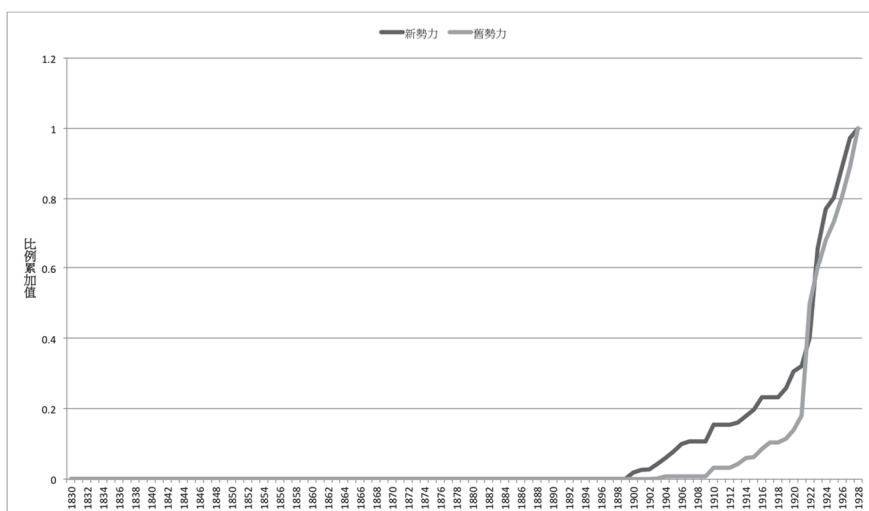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除受「以勢為主」與「尚力說」的思想影響外，還因帝國列強實際外交主權上「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等複合概念影響下的實際侵略，更強化了「以勢為主」與「尚力說」的認知。所謂「勢力範圍」是近代國際法學家用於西方列強在非洲爭奪殖民地時期，指稱那些留待強勢國家佔有的鄰近領土或區域，在這些區域中列強擁有次於領土主權的權利，因此對於尚未達到對殖民地或附屬國所享有的權利程度的區域，外交術語上稱為「勢力範圍」；近代以來，列強將原先用於殖民地「非洲」的「勢力範圍」概念用於半殖民地「亞洲」的現象，顯示出「勢力範圍」概念的濫用。³⁹「勢力」概念在近代中國融入了尚力與進化論思想，則其現代化轉型的論述如何形成？「新／舊勢力」的交鋒，所攻擊的舊勢力與所提倡的新勢力為何？「新／舊勢力」交鋒的發展軌跡如何？本文嘗試從巨觀視野遠讀數據結構出發，與前述的定性分析進行對話與補充，結合前述圖四、五中的「新／舊勢力」的歷年比例累加值曲線，繪製成圖八。

從圖八可見「新勢力」概念起自於 1899-1901 年庚子事變後，用以指稱列強新勢力，且大部分來自譯文，如 1905 年譯自英國《哈羅報》的〈論亞洲諸國之將興〉提到的「新勢力」，係指「華人抵制美約禁購美貨」的抵制行動，對美國新勢力造成很大影響。⁴⁰又如 1905 年〈論日俄戰後歐洲之國際〉譯自日本《外交時報》，係從日本立場

年），頁 53。

³⁹ 李雙元、黃惠康主編，《國際法》（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2000 年）；王雲紅，〈「勢力範圍」概念考釋〉，《蘭州學刊》2007 年第 1 期，頁 178-181；王雲紅，〈勢力範圍：一個概念在近代中國的形成與發展〉，《重慶社會科學》2007 年第 10 期，頁 67-73。

⁴⁰ 〈論亞洲諸國之將興〉，譯英國一千九百五年九月九日《哈羅報》，《外交報》第 5 卷第 28 號（1905 年 11 月 21 日），頁 7-8。



圖八：「新／舊勢力」關鍵詞歷年使用詞頻比例累加圖⁴¹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觀察日俄戰爭（1904-1905）之後，歐美與日本的相互關係及新的國際局勢，文中認為美國是遠東國際新政局中的一股帝國主義「新勢力」，不容忽視。⁴²

「舊勢力」一詞自 1904 年後有極少的用例，但與「新勢力」概念已有交鋒，以是否具有「軍國民思想」，或是「立憲／專制」之別，做為新／舊勢力的判準。如 1903 年〈民族主義之教育〉係根據日人所論增益而出，主要呈現日人的軍國民教育主張。其中論及要在中國進行革命，需對中等與下等社會進行社會教育動員，而非依靠家庭與學校教育。而下等社會教育部分，則需與秘密社會、勞動社會、軍人社會為伍，藉以改變其舊思想、舊知識、舊勢力，進而灌注新思想、

⁴¹ 已減去新舊共出詞頻。

⁴² 〈論日俄戰後歐洲之國際〉，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九月十日《外交時報》，《外交報》第 5 卷第 23 號（1905 年 10 月 3 日），頁 12-13。

新知識以及聳動成新勢力。⁴³ 可見是以軍國民思想為核心而呈現新／舊勢力的交鋒。1904 年〈所謂大隈主義〉係《新民叢報》引介日本憲政本黨首領伯爵大隈重信（1838-1922）的演講內容後，由梁啟超加以評論的文章。大隈重信反對當時歐美在東亞細亞劃分「勢力範圍」，主張「東亞細亞者，東亞細亞人之東亞細亞也」，與門羅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文中提及新／舊勢力，是以「舊勢力」指稱俄國在亞細亞的勢力，而日本自詡為「新勢力」，所謂「新」，是指日本吸納世界文明，利用科學以脫離中古專制封建之羈絆，實行立憲政治，制定憲法，擴張自由等。⁴⁴ 新／舊勢力的判別標準在於「立憲」與「專制」之別。綜上可見，晚清之際對於新／舊勢力的概念內涵並未範定。

而辛亥革命後至 1920 年階段，「舊勢力」一詞的使用高出於晚清，然「新勢力」的使用仍多於「舊勢力」。如 1914 年〈政力向背論〉提及時人將民初共和亂局的原因歸之於新／舊勢力——理想派（國民黨）與經驗派（袁政府）——的衝突，雖有語病，但不失為事實。由於「舊勢力之不能盡倒」，因而作者認為國民黨作為新勢力以盡倒舊勢力乃根本大誤，主張不同政黨應當兩力相劑，同趨共守。⁴⁵ 可見新／舊勢力概念在當時具有二元的革命論式意涵。

另，1916 年〈國人之一念〉作者從佛學中領悟到國人之一念的重要，可促成法國大革命（1789-1799），也能推動辛亥革命，因而提出以正念對治時局。其中指出針對民初政治不良時的革命行動有兩種結果：其一，新勢力成功破壞舊勢力，或是僅融化吸收幾分之幾而歸併於己；其二，革命者並非真正新勢力，不是完固組織體，因此無法完全破壞敵對的舊團體，只能草草取代承襲故物，收其餘燼，如此舊勢

⁴³ 〈民族主義之教育〉，《遊學譯編》第 10 冊（1903 年 9 月 6 日），頁 1-9。

⁴⁴ 飲冰（梁啟超），〈所謂大隈主義〉，《新民叢報》第 3 年第 9 號（原第 57 號）（1904 年 11 月 21 日），頁 60-73。

⁴⁵ 秋桐（章士釗），〈政力向背論〉，《甲寅》第 1 卷第 3 號（1914 年 7 月 10 日），頁 1-23。

力雖暫時解弛，卻能伺機而動。⁴⁶ 可見，新／舊勢力的論述，已然成為「革命論式」的概念。

迨至 1920 年，「革命論式」的新／舊論述更為明顯，如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為反對毛澤東（1893-1976）⁴⁷ 等人提倡的「個人主義的」新村運動，主張「社會的」新生活。文中立基於「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的思維，認為「改造社會須從改造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胡適反對「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的主張，因會落入「完全發展自己個性」的「獨善的個人主義」；而是必須透過點滴改造社會的種種勢力，且改造時遇到「反對的舊勢力」，應當做正當奮鬥而不可退縮；須使「社會的舊勢力不能不讓我們」，而不能自己先退出社會，將社會讓給「舊勢力」。⁴⁸ 胡適雖未直接言明新勢力，但提出舊勢力時，基本上當下應有另一股力量存在，即使不稱為新勢力，但仍是有一股相對於舊勢力的現有力量存在，顯見是一種近「革命論式」的二元對立思考。

及至 1921 年後，「新／舊勢力」開始同步湧現。如 1921 年〈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錄《覺悟》）〉強調社會主義者應集中權力，才能不被資本主義的反革命黨驅逐，文中指出「舊勢力」雖經一次社會革命破壞，但仍潛伏在如資本家、中產階級、不肖軍官、守舊分子、無聊政客、不工作的游民暴徒之中。可見新／舊勢力的判準內涵

⁴⁶ 歐陽仲濤，〈國人之一念〉，《大中華》第 2 卷第 3 期（1916 年 3 月 20 日），頁 1-10。

⁴⁷ 毛澤東於《湖南教育月刊》1919 年 12 月號發表〈學生之工作〉一文謂：「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毛澤東，〈學生之工作〉，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年），頁 454；原刊於《湖南教育月刊》第 1 卷第 2 號，1919 年 12 月 1 日。

⁴⁸ 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新潮》第 2 卷第 3 號（1920 年 4 月 1 日），頁 467-477。

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⁴⁹ 又如面對新／舊混淆曖昧的情況，1922年〈破壞與建設及其預備工夫〉以二元對立的「革命論式」指出新舊「不相容」之處：其一，主張不相容，像是帝國主義與民主主義；其二，方法不相容，像是舊政界者辦教育都是為了增門面，而非真正要為社會做事，⁵⁰ 唯有先破壞舊勢力，新勢力才能開始建設，新／舊勢力沒有調和的餘地。

可見，辛亥革命後至1920年階段，「舊勢力」一詞的使用明顯高出於晚清，而「新勢力」的使用則大於「舊勢力」，此時新／舊勢力二元對立的論述越發明顯，或指國民黨與袁政府的衝突，或指社會的生活與個人主義的生活的區別，新／舊勢力的論述明顯具有二元對立的「革命論式」色彩。直至1921年後，新／舊勢力的論述始同步湧現，成為水火不容的兩個陣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對抗與交鋒的位址，新／舊勢力的話語交鋒已然進入高度意識形態化。

晚清之際，新／舊論述並未同步出現，因當時的「新勢力」主要呈顯為一種「改革力量」，而非一種「革命力量」，唯有在「革命」意識下新／舊才會直接交鋒與激辯，若是「改革」則不需提出「舊勢力」作為對立對象，只需揭舉「新」以進行改革，這是使用「新勢力」以言行事與以言取效⁵¹的目的。但從晚清至民初，「勢力」論述逐漸走向激進化，1920年後「舊勢力」與「新勢力」同步交鋒，明顯呈現出新／舊勢力二元對立的革命論式，正是與五四時期意識形態化與激進

⁴⁹ 新凱，〈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錄《覺悟》）〉，《新青年》第9卷第5號（1921年9月1日），頁1-7。

⁵⁰ 李璜，〈破壞與建設及其預備工夫〉，《少年中國》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頁30-36。

⁵¹ 劍橋學派政治思想的歷史方法論，立基於英國哲學家約翰·奧斯汀（J. L. Austin, 1911-1960）的言語行為理論（Theory of Speech Act），更注重「以言行效」及言說主體的意圖與言說效應之間的關聯。參見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3-127.

化思維相互影響所致。

3.道德

「道德」一詞是中國傳統根深柢固的概念，意指人類共同生活時，行為舉止合宜的規範與準則。⁵² 然近代中國知識人經由東學，會通了中國傳統道德概念與西方「moral」概念與日本的「道德」概念，完成了近代中國「道德」概念的現代轉化。西方的「moral」概念一詞源自拉丁文「mores」，表示「慣習」、「風俗」或引申為道德原則、道德規範、行為品質、善惡評價。⁵³ 日本在明治時期學習西方「moral」概念後，化生出東學視野中的「日本道德」概念，其與西學不同的東學特徵有兩點：其一，福澤諭吉（1834-1901）將「道德」與「富足」聯繫起來，「道德」與「富足」兼具才是「文明」的狀態，而「道德」是「文明」的一個構成要素，是體現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從而使日本道德概念具有道德工具化的內涵；其二，福澤諭吉發展出西方倫理學中所沒有的「公德」與「私德」（為傳統東方道德留下生存空間，作為個人心性修養的道德觀）概念；其三將原本針對個人品行的要求，轉化為對一國人民整體的品行要求。歸結日本近代道德概念的特殊性，即在於從個體修身準則到國民整體修身準則的「國民道德」的內涵轉化，亦即將「國家」定義為最上位的人倫型態，形成一個包攝諸人倫型態的國家倫理學。⁵⁴

⁵² 如《荀子·勸學》謂：「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冊上，卷1，頁12。

⁵³ 徐曼，《西方倫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2；陳瑋芬，〈「倫理」、「道德」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轉化與再生——與近代中國的比較〉，收入李明輝、邱黃海主編，《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年），頁232。

⁵⁴ 陳瑋芬，〈「倫理」、「道德」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轉化與再生——與近代中國的比較〉，頁255-271；李萍，〈日本近代「道德」、「倫理」概念的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頁79。

面臨中國舊道德已然失能及內外雙重危機下，近代中國知識人主張從西學與東學學習「新道德」概念。近代中國知識人主要從「道德進化論」轉化最為根本而不能變動的傳統「道德」概念，這一工作得力於嚴復（1854-1921）引進《天演論》。嚴復譯介進化論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變革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由於「世道必進，後勝於今」，⁵⁵使倫理道德變革涵具了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理據；其他也得力於戶水寬人（1861-1935）《道德進化論》與加藤弘之（1836-1916）《道德法律進化之理》等思想的譯介。晚清之際道德進化論的思潮，為日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倫理革命提供了思想來源，⁵⁶如陳獨秀〈答淮山逸民〉云：「蓋道德之為物，應隨社會為變遷，隨時代為新舊，乃進化的而非一成不變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適於今之世也。」⁵⁷明顯主張道德應隨社會變遷而進化。

「道德進化論」具合理性與合法性後，晚清知識人隨而調整、賦予「道德」概念新的內涵。如徐曼指出梁啟超分析「道德起源論」時，認為道德的起源不是中國傳統內在超越的天理良知，也非西方外在超越的神的意志，而是產生於一定的社會關係，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⁵⁸此外，也指出嚴復在傳統倫理中設置了道德的自由與權利論，將私利的地位凸顯並指出「義」之所在即為「利」，及主張追求快樂並獲得快樂即是「善」，更新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內容，影響著中國傳統道德發展的方向。⁵⁹近代中國道德概念的現代性轉化，係轉向於群、公、自由、權利等方向，強調道德的社會屬性，以及用經驗科學

⁵⁵ 此八字出自嚴復對〈導言十八·新反〉中的按語。參見〔英〕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著，嚴復譯，《天演論上·導言十八·新反》，收入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冊5，頁1360。

⁵⁶ 徐曼，《西方倫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頁89-103。

⁵⁷ 陳獨秀，〈答淮山逸民〉，《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668。

⁵⁸ 徐曼，《西方倫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頁199-200。

⁵⁹ 徐曼，《西方倫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頁90-91。

歸納法以理性審視「道德」的概念內涵，視倫理學為實踐科學，從「以道德規定幸福」（認為有道德的人生便是有價值的幸福的人生）轉向「以幸福規定道德」（認為離開人的幸福後道德將無從談起）；從「義務論」（遵循道德是人們無可逃脫的義務）轉向「功利論」（道德是為使每個人的正當利益都獲得合理滿足所設立的一切行為的基本原則和規範），⁶⁰ 這是近代中國道德概念現代化轉型的最大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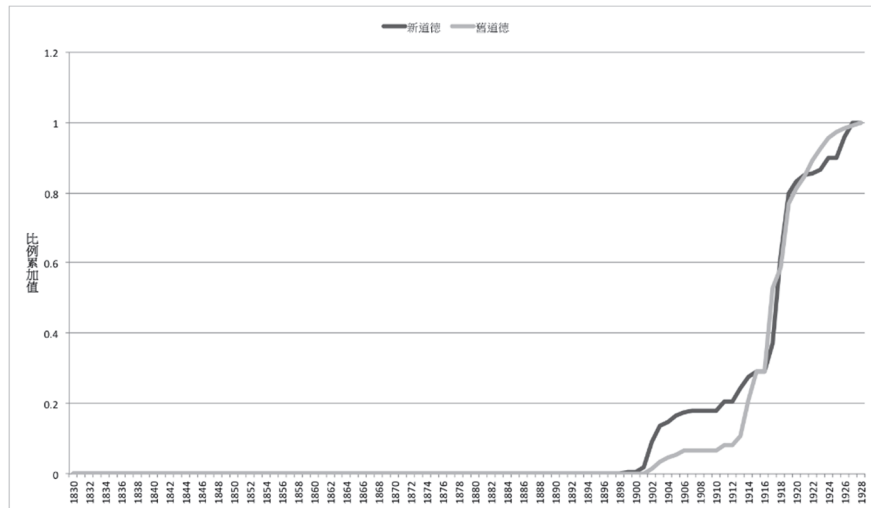
至於為何中國傳統「道德」概念需汲取西學與東學而完成「道德」概念的現代化轉型？這源於近代中國知識人深具「道德決定論」的思維慣例，如徐曼指出近代中國知識人認為道德高低有無和國家生死存亡密切關連，不論立憲派梁啟超或是革命派章太炎（1869-1936），均認為唯有具備「道德」，才能完成立憲與革命行動，正因「道德決定論」的思維慣例，使得「道德」概念在近代中國的觀念系統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⁶¹ 也因近代中國「道德決定論」具有很強的「救亡」的目的性，因而伴隨著晚清與民初「救亡」訴求的不同，分別展現出「道德」概念的兩階段發展，而辛亥革命又是促成道德概念二次現代化轉型的重要事件。辛亥革命後，許多舊道德概念與民主共和國體制精神不符，舊道德倫理合法性被剝奪，新道德倫理秩序未建立，民初之際處在倫理失範的社會氛圍中，從而使五四時期道德倫理價值產生劇烈的衝突矛盾，正是為解決問題危機，五四後乃開始全面引進泰西新倫理學，而形成「新道德」概念的二次湧現。⁶² 以下嘗試從巨觀視野遠讀數據結構出發，與前述的定性分析進行對話與補充，結合前述圖四、五「新／舊道德」的歷年比例累加值曲線，繪製成圖九。

從圖九可見「新道德」概念起於 1899-1901 年庚子事變後，這時「舊道德」一詞雖已出現但不如「新道德」使用的多，如 1901 年梁

⁶⁰ 徐曼，《西方倫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頁 265-266。

⁶¹ 徐曼，《西方倫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頁 147-148。

⁶² 徐曼，《西方倫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頁 148-149。



圖九：「新／舊道德」關鍵詞歷年使用詞頻比例累加圖⁶³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啟超〈過渡時代論〉指出當時社會雖厭棄道德三綱的壓抑與虛文縛節之俗，但尚未能以「新道德」代之，因此為理想風俗上的過渡時代。⁶⁴ 文中並未以「舊道德」對論之，可見當時對於中國傳統道德並未興起革命意識。1902年梁啟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也是從「改革論式」的思維框架下提出「新道德」：「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新世界。」⁶⁵ 梁啟超「改革論式」的「新道德」概念內涵，從1902年〈新民說〉可見，利群的「公德」即為「新道德」，而有此新道德則「新

⁶³ 已減去新／舊共出詞頻。

⁶⁴ 任公（梁啟超），〈過渡時代論〉，《清議報》，1901年6月26日，收入梁啟超、馮鏡如等編輯，《清議報》，冊10，第八十三冊，頁5283-5290。

⁶⁵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8日），頁11。

民」出焉。⁶⁶ 可見立憲派主張「新道德」之「新」，係涵具「利群」的「公德」之意。

梁啟超基於改革論的立憲派立場，雖提出「舊道德」，但並未將之擺在新道德的對立面而加以攻擊。但革命陣營為了強化二元對立的革命論式，必須提出新／舊道德的對立框架，才能鼓動革命組織勢力。實際上晚清之際已有攻擊「舊道德」的言論，如 1903 年〈國魂篇（續第一期）〉指出，時人認為不應破壞道德，因可能產生「舊道德已去，新道德未來」的弊病，但作者指出中國並未有「舊道德」，因可稱為「舊道德」的仁義禮智等，已為八股蟲蝕之空空；既然連「舊道德」都沒有，就更該趕緊學習「新道德」。作者的立場係以新道德「取代」舊道德，文中「水與空氣」不能並存於杯中的譬喻——「不注水於杯中，則杯中之空氣，永不能出也。」——明顯可見係以「取代」的思維立論，這與梁啟超「調和」的思維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革命陣營從「革命論式」的思考出發，強化新／舊道德二元激辯的論述，藉以提振革命意志與力量。正因中國風俗積之千年，同化之力強大，能夠融化德性不堅定者，因此唯有「取代」，才能避免因循苟且度日，⁶⁷ 故而主張以「新道德」取代「舊道德」。「取代」作為革命黨人的思維慣例，透過新／舊道德二元對立之激辯，適足以調動集體認同與社會行動，而這無疑是革命與立憲兩派知識分子思維結構與世界觀的最大歧異點。

至於革命陣營者的「新道德」為何？1903 年〈教育與群治之關係〉指出，應當教育學生「以救亡國亡種為宗旨，以愛同胞合羣力為精神，以輸灌新道德新智識為手段。」⁶⁸ 「新道德」是一種具有愛國精神、種族主義、合群觀念的道德。就愛國與合群而言，與立憲派主

⁶⁶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三〉，《新民叢報》第 3 號（1902 年 3 月 10 日），頁 1-7。

⁶⁷ 飛生（蔣百里），〈國魂篇（續第一期）〉，《浙江潮》第 3 期（1903 年 4 月 17 日），頁 19-30。

⁶⁸ 〈教育與群治之關係〉，《湖北學生界》第 4 期（1903 年 4 月 27 日），頁 23。

張的新道德一致，而不同之處在於種族主義。又如 1903 年〈教育私議〉強調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應組織教育機關與實行教育事業，才不會在舊學已去、舊思想已除、舊道德已破壞之際，無新學、新思想、新道德補救之，致使社會墮落。論調看似不具二元性，但文末指出，漢族子孫不能為北方蠻族所教育；若然，則在中國奴隸教育底下將「永受羈壓，萬劫不復」。⁶⁹ 可見，立憲派與革命派在「新／舊道德」的概念基本上相同，均以民族國家／君主國家為新／舊的區別，但不同點在於，革命派的新道德除愛國之外，還須愛種族，因而，革命派所批判的舊道德，除中國傳統道德外，還包含了滿清奴隸教育底下的奴隸道德。又如 1905 年〈辨論與受用（續第六十五號）〉以立憲派立場，強調必須追求「新道德」，「新」的內涵即自由民權風潮，而與革命陣營有些微不同。⁷⁰

在 1905 年至 1910 年階段，新／舊道德的交鋒淡化，直至辛亥革命後才再度湧現，則 1913 年後新／舊道德交鋒的議題與目的為何？與晚清之際有何異同？

辛亥革命後，有關「道德」的討論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細緻，這當與晚清以降不斷譯入西方道德倫理學專著有關，促使近代中國知識人更為深刻的思考有關「道德」之問題。1911 年〈論道德〉嘗試改變「新／舊道德」的論式為「真／偽道德」，文中指出與其談「新道德」不如用「真道德」（指的是根於心理的天然道德，如自由、平等、博愛），「舊道德」不如改用「偽道德」（指源於習慣的人為道德，如綱常名教）。⁷¹ 可見民初之後對於「道德」的理解越來越深刻，也意識

⁶⁹ 沼胡，〈教育私議〉，《江蘇》第 5 期（1903 年 8 月 23 日），頁 43。

⁷⁰ 觀雲（蔣觀雲），〈辨論與受用（續第六十五號）〉，《新民叢報》第 3 年第 18 號（原第 66 號）（1905 年 4 月 5 日），頁 1-10。

⁷¹ 憤民，〈論道德〉，收入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 年），卷 3，頁 847-853；原刊於《克復學報》第 2、3 期，1911 年 8、9 月。

到「舊道德」中有天然的成分，「新道德」中有人為的成分，因此改用「真／偽道德」進行論述。

至於民初知識人則將「新道德」視為「西方而來者」，「舊道德」為「發源中國者」，而有以「新道德」取代「舊道德」之說，新／舊道德交鋒逐漸激進化與意識形態化，傾向於革命論式的道德主張。康有為（1858-1927）1913年〈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指出，當時認為「新道德」即來自於法國大革命下的人道主義，其關鍵為博愛、平等、自由，而將「孔子之學」打為「舊道德」；康有為則指出《論語》、《大學》早已具人道主義關懷，以西方人道主義新道德取代中國仁者思想者，乃是謬譬之言。⁷² 可見當時「新道德」已經被意識形態化為來自於「西方」，而「舊道德」為「中國儒家之學」。

實質上，近代中國部分知識人始終並未在「道德」概念上樹立太強的對立的「革命論式」的新／舊交鋒，這或許是中國傳統道德始終是知識人生命存有的皈依與理想的投射，既是人倫禮儀的規範，也涵具形而上體道的層次。如同1914年〈迷而不復〉指出革命者與其追求新道德，不如追求新法制，因為新道德是由新法制而來，並非直接得到。⁷³ 1915年〈國民生存之大問題〉也明確指出，民初之際青年浮動，逾越常軌，乃肇因於新道德未實現，舊道德的勢力不足規範之；面對「道德失能」的現象，作者認為不要再以革命論式對立新／舊道德，道德適國民之用即可，正如其言：「道德何分新舊，蘄足適國民之用而已。」⁷⁴ 可見，革命論式的新／舊道德交鋒在當時並非未獲致完全的肯定與支持。

⁷² 康有為著，湯志鈞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康有為政論集》，冊下，卷3，頁842-849。

⁷³ 無卯（章士釗）著，章含之、白吉庵主編，〈迷而不復〉，《章士釗全集（1914.5.10—1916.1.10）》（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卷3，頁226-230；原刊於《甲寅》第1卷第3號，1914年8月10日。

⁷⁴ 兼士（沈兼士），〈國民生存之大問題〉，《大中華》第1卷第8期（1915年8月20日），頁9。

又如 1915 年〈新舊問題〉認為新／舊交鋒已使全國人心無歸宿，當新舊雜陳，人無所適從時，必須解疑，進行辯證。文中認為天下本有是非而無新舊，只是天下是非演進無定律，故須假新舊之名以對是非進行標誌。作者指出新舊交鋒的弊端在於新舊旗幟不明，主要原因在於新舊觀念與界說不明，因新舊係由比較而來故本無標準，然無標準則易引發問題，故作者加以定義：「新」指「外來之西洋文化」；「舊」是「中國固有之文化」，新舊之爭所要爭論的是外來的西洋文化與中國固有文化根本相容性的問題。作者認為不管是新或是舊，適合於世界均可，但文中以「新舊之不能相容，更甚於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的修辭譬喻，強調新舊不能相容，擇定一方，則須排除、廢棄另一方。作者是從歷史經驗中揭櫫新舊不相容的主張，他指出清末維新三十年未成，正是因為只比較新舊而未體認新舊的根本差異，使得只解決一事物之新舊，一旦新舊之說越多，則新舊的界線越晦暗不明，新舊之爭就越發不可收拾，這是中國的根本大患，不解決則國家與個人都無法有所歸宿，故作者提請未來主人翁能選擇一方而捨棄另一方。⁷⁵

由上可見，當時新舊之交鋒致使社會陷入文化失範的困局，而新／舊也逐漸難以區分。正如 1917 年〈生存競爭與道德〉指出辛亥革命之後，舊道德與新政體扞格而被毀廢，但新道德又未成立，社會處在復古之說、或東或西之中，不知方向。文中認為：「顧道德無擇於新舊，但問其適於固吾國，保吾羣之生存與否？適者存之，不適者則不憚更張之。」⁷⁶ 可見，民初部分知識人認為二元對立的革命論式之新舊交鋒不應落在「道德」層次，因「道德」可超越「新舊」，以「適者」為宜。又如 1919 年〈論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也明確指出「因時制宜」的「新道德」的標準有三：一，人道主義；二，發達個

⁷⁵ 汪叔潛，〈新舊問題〉，《新青年》第 1 卷第 1 號（1915 年 9 月 15 日），頁 1-4。

⁷⁶ 高硯石，〈生存競爭與道德〉，《新青年》第 3 卷第 3 號（1917 年 5 月 1 日），頁 5。

人利己心；三，極端自由思想，而這三者新道德標準乃對立於僅為權利義務的「孝道」。文中認為「新國民」的建造必須透過建立「新道德」的思想革命以完成，而思想革命的關鍵，在於除去保守盲從、法古則古之習慣，換以自由意志精神。⁷⁷ 可見「新國民」與「新道德」的「新」之結穴，即在於「自由意志」之上。如此明確為「新道德」定義的作法，也是解決新舊道德曖昧的方法之一，如 1918 年〈新青年之新道德〉指出「新道德」乃是創造的、進取的、需用知識的，⁷⁸ 尤體現出民初知識人希望解決新舊道德混淆曖昧的困局的心情與作為。

然而，「新舊道德」的交鋒到後來更為激進化，如 1919 年〈破壞〉指出中國原有道德思想，並未為人所信服，若不先破壞，怎能引進新的，正如「渾水滿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渾水傾去，清水才能鑽進來。」⁷⁹ 因此作者認為一面創造新道德之際，也要一面破壞舊有主義。又如 1919 年俞平伯（1900-1990）〈我的道德談〉指出「新道德」的內涵有四：尊重個性獨立、發展博施情愛、限制縱慾、戒絕虛偽，並認為新舊衝突有兩種解決法：漸進與急進。作者主張急進，認為唯有衝破一切網羅，用新道德取代舊道德，實行道德革命，才能澄清思想界。⁸⁰ 當時常見新舊不能調和的激進化看法，道德概念的激進化使得「革命論式」的新／舊道德交鋒凸顯於五四時期。如 1919 年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也肯定新舊道德的新陳代謝，他認為道德係由社會而生，適應著社會；一旦社會變動，道德即失去其運命與價值，成了「舊道德」，⁸¹ 道德是依據著社會的發展而新陳代謝的變動

⁷⁷ 吳康，〈論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新潮》第 1 卷第 2 號（1919 年 2 月 1 日），頁 329-335。

⁷⁸ 陶履恭，〈新青年之新道德〉，《新青年》第 4 卷第 2 號（1918 年 2 月 15 日），頁 94-98。

⁷⁹ 孟真（傅斯年），〈破壞〉，《新潮》第 1 卷第 2 號（1919 年 2 月 1 日），頁 349。

⁸⁰ 俞平伯，〈我的道德談〉，《新潮》第 1 卷第 5 號（1919 年 5 月 1 日），頁 883-895。

⁸¹ 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新潮》第 2 卷第 2 號（1919 年 12 月 1 日），頁 207-224。

體。

正因民初之際未樹立二元對立的新／舊道德論式，因而使得新／舊道德逐漸難以區分，當時知識人大致有三種回應方式：其一，明確定義「新道德」的概念內涵，如定義「新道德」為自由意志精神（吳康〔1897-1976〕），是創造的、進取的、需用知識的（陶履恭〔1887-1960〕），是尊重個性獨立、發展博施情愛、限制縱慾、戒絕虛偽的（俞平伯）；其二，採取避談新／舊道德問題而改為追求新法制的方式（無卯〔1881-1973〕）；其三，提出道德不分新舊，當以國民適用為考量（兼士〔1887-1947〕）。不過，上述三種迂迴或回避直接討論新／舊道德的方式，並不能有效處理新／舊道德混雜，使人無所適從的困局，因此革命派人激化了新／舊道德的交鋒，直接指出新／舊道德不能調和，藉此逼顯出新／舊道德的真正內容。可見，革命論式的新／舊道德的交鋒，是在民初知識人意識到世界與社會發展已與中國過去千年有決然不同的改變中提出，正因世界與社會已然不同，道德自然需要改變，從「舊道德」轉向「新道德」，乃藉以適應世界與社會的變化。

4. 社會

雖然中國傳統已使用「社會」一詞，⁸² 但其概念與近代西方「社

⁸² 中國傳統「社會」一詞意義：其一，如《世說新語補》：「王叔治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修社會，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隣里為之罷社。」意指鄰里老鄉互相聚集廟會，或春秋社日迎賽土神的集會，見〔南朝宋〕劉義慶著，〔明〕何良俊增補，〔明〕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卷1，頁9；其二，《舊唐書·玄宗紀上》：「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用以指涉「村民集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冊1，頁195；其三，志趣相同者結合的團體之義，如朱熹《近思錄》選輯程頤〈明道先生行狀〉謂：「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見〔宋〕朱熹編，《近思錄》（臺北：金楓出版，1997年），卷9，「治法」條，頁98。有關中國傳統「社會」一詞意義，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收入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512；陳力衛，〈詞源（二則）：社會〉，收入孫江、劉建輝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1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會」概念有所不同，經由東學，近代中國完成了「社會」概念的現代轉化。

日本從明治六年（1873）後開始傾向使用「會社」對譯「company」，指涉以營利為目的的結社，到明治八年（1875）左右日本政論家福地櫻痴（1841-1906）以「社會」確定為「society」譯詞的轉型，然而對譯的內容仍有些混亂，主要因為結黨禁令使近世時期日本人無法理解西方在公共設施的修建、政治、經濟、醫療、福利乃至學術等各個領域內存在著大量團體、結社體，且體現出堪比官方的活動能力，因而認為「society」是一個幾乎無法翻譯的概念，而產生「society」究竟是「company」類之組織機構？或是僅指稱多數人聚會？抑或是應與「community」對譯？甚至捨棄傳統日語、漢語，以全新詞彙如津田真道（1829-1903）所首倡的「相生養之道」或福澤諭吉所提出的「人世交際（之道）」之對譯。當時福澤諭吉正因意識到近世模式、儒家模式的人際關係（兼具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權力的非對稱與人的同一同質性）不同於近代歐洲的統治及其社會構成的原理（對等與差異相結合），因此才另造新詞對譯西方「society」概念。而在日本思想家於1875年還在多方討論西方「社會」概念該如何翻譯較為適切的10年之後，⁸³ 1887年黃遵憲（1848-1905）在《日本國志》中就将福地櫻痴「society」譯為「社會」的用法帶到中國，金觀濤與劉青峰認為這種意指志趣相同的個人結合成某種團體的日本明治時代的「社會」概念內涵，正是中文「社會」一詞的本來含義。⁸⁴

年），頁194。

⁸³ 〔日〕木村直惠著，顧長江譯，〈「社會」概念翻譯始末——明治日本的社會概念與社會想像〉，收入孫江、陳力衛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2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頁138-153。

⁸⁴ 陳旭麓，〈戊戌時期維新派的社會觀——群學〉，《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頁163；陳力衛，〈詞源（二則）：社會〉，頁194-206；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頁512。

雖然 1887 年黃遵憲已譯介福地櫻痴的「社會」概念，但因中國傳統早已存在「群」的概念，因此日本的「社會」概念需與「群」的概念進行比拼後，才能取代「群」而進入近代中國的思想觀念視野中。關於「群」與「社會」概念的互動，前人多有研究，一開始東學中的「社會」一詞，僅用於談論公司及引進西方社會學說，而提及中國社會組織時，仍以「群」指稱志趣相同的個人結合成某種團體，或指人類生活在其中的組織及其整體。而近代中國「群」的概念之興起，是因時人想以「群」的概念解決因家族凝聚力強固，致使國家和個人之間隔離，因而難以相通的困境；特別是「群」的概念在近代中國政治脈絡上也發生變化，如傳統「群」之概念泛指多數和會合組成集團之意，並未與「君王」有密切聯繫，但在戊戌變法前後，主張改革的士大夫強調君能合「群」，故在選擇性強調後的「群」之概念實與晚清改革立憲派陣營密切相關。⁸⁵

至於「群」後來被「社會」一詞取代的原因，前人曾論述如下：其一，因人們認識到理想化的統一的「群」不可行，承認必然存在差異的「社會」才符合當時世界現狀；其二，當時出現的新名詞如國家、個體、革命、改革、民族等，均與「社會」有關，而與「群」關係較少，並在民族國家主義方能救亡思潮下，自然捨棄帶有儒家政治意涵的「群」而改用「社會」一詞；其三，「社會」概念係由自治部分組成的合成物的有機體，其內部是由獨立的個體相互聯結、彼此依存、共同生活，具有區分、動態、冷酷、涼薄、腐敗、需不斷重造、可組織的色彩，不同於統一、靜態、溫暖、同質、道德、不需鑄造與解釋的「群」，更符合進化論思潮、社會有機體論與當時世界現狀，「造社會」概念的出現，正體現出上述指出的「社會」概念特徵。⁸⁶ 本文認

⁸⁵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頁 519。

⁸⁶ 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會」論——從兩份未刊殘稿談起〉，收入許紀霖、宋宏編，《現

為驅使「群」到「社會」的概念之新陳代謝，伴隨著正是從「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道」到「物競天擇淘汰制的進化之道」的「道」的轉向。

日本「社會」概念傳入近代中國後，當時知識人也開始思考與討論「社會」概念，藉以強化對「社會」概念的理解。如 1904 年之際「造社會」的論述，直接指出「社會」是能保公共之利益者，有公益者為社會，無公益者非社會。而晚清「造社會」的論述也被五四時期民初知識人所繼承，但晚清與民初的「造社會」論述重點不同，晚清時期康、梁主張「政治社會非對抗論」，民初時期知識人則主張「政治社會對抗論」。⁸⁷ 正因晚清與民初對於「社會」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也產生「社會」概念的二重現代轉化。則「社會」概念在近代中國融入進化論思想所產生的現代化轉型為何？當「社會」概念連結上「新／舊」論式，所具有的歷史意涵為何？新／舊社會的交鋒，所攻擊的舊社會及所提倡的新社會為何？新／舊社會交鋒的發展軌跡如何？下文嘗試從巨觀視野遠讀數據結構出發，與前述的定性分析進行對話與補充，結合前述圖四、五中的「新／舊社會」的歷年比例累加值曲線，繪製成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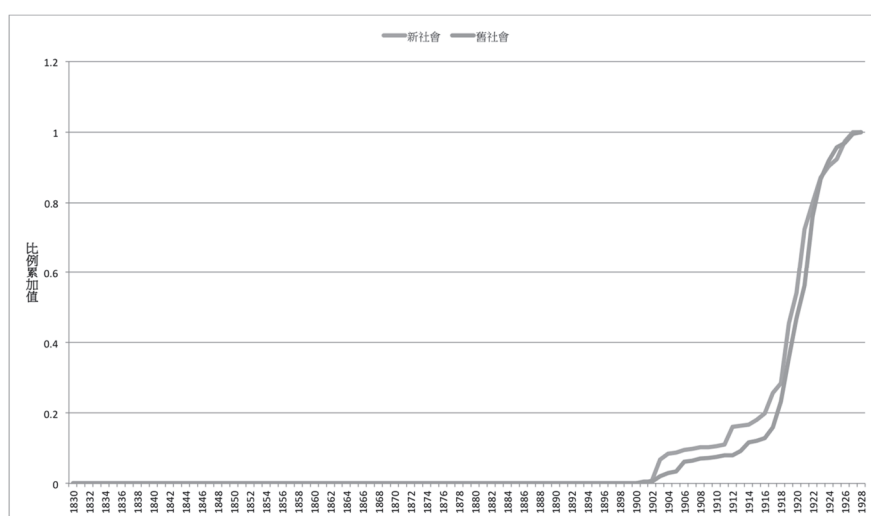
正如馮凱調：「社會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有歷史性，很容易被拉到時間裡去。很快，這個詞就常被用來區分『舊社會』和根本上發生變化的『新社會』」。⁸⁸ 「社會的概念也混合了一種時間性維度，這種維度反映了現代性本身的時間結構，此中所有一切都確實受制於變

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頁 550-562；原刊於《中國文化》1996 年第 14 期，頁 203-212；黃興濤，〈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代性」問題——兼論「思想現代性」與現代性「社會」概念的中國認同〉，《天津社會科學》2005 年第 4 期，頁 135；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頁 513-535；〔德〕馮凱（Kai Vogelsang）著，朱聯璧譯，〈中國「社會」：一個擾人概念的歷史〉，收入孫江、陳力衛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 2 輯，頁 124-137。

⁸⁷ 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會」論——從兩份未刊殘稿談起〉，頁 203-212。

⁸⁸ 〔德〕馮凱著，朱聯璧譯，〈中國「社會」：一個擾人概念的歷史〉，頁 132。

遷。」⁸⁹ 從圖十可見「新社會」概念起自於 1902 年後，這時「舊社會」概念雖已出現但不如「新社會」使用的多，則這時新／舊社會概念內涵為何？使用新／舊社會以言行事與以言取效的目的為何？下文嘗試從當時新／舊社會一詞的語料來揭示。



圖十：「新／舊社會」關鍵詞歷年使用詞頻比例累加圖⁹⁰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1903 年〈新社會之理論〉主張舊社會退步、新社會進步，而退步者被淘汰，進步者適存，就像同一民族中若談新舊，並非指有兩部分「搏噬不相下」，而是「適存不適存」；其中指出「共產主義」與「極端民主主義」為「新社會之主義」。⁹¹ 可見晚清「新／舊社會」概念，意謂著「適存」與否，且出現以共產主義與極端民主主義的「新社會」。

⁸⁹ 〔德〕馮凱著，朱聯璧譯，〈中國「社會」：一個擾人概念的歷史〉，頁 133。

⁹⁰ 已減去新舊共出詞頻。

⁹¹ 大我，〈新社會之理論〉，《浙江潮》第 8 期（1903 年 10 月 10 日），頁 9-21。

1905-1911 年新／舊社會的交鋒淡化；1911-1919 年則逸出平緩的發展趨勢，開始產生波動，但並未產生強烈的新／舊社會的交鋒；迨至 1919 年之後，新／舊社會的交鋒大幅同步湧現，也更勝於晚清時期。五四時期論及新／舊社會時，均肯定要從「舊社會」走向「新社會」，因此，新／舊社會交鋒的關鍵在於如何從「舊社會」走向「新社會」，如 1921 年〈從資本主義組織到社會主義組織兩條路——進化與革命〉指出雖有「進化」與「革命」兩途可從「舊社會」走向「新社會」，但作者支持「革命」一途。⁹² 又如 1921 年〈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指出「道德的共產主義」中的「新村派」，如美國克貝（?-?）1848 年在泰克塞斯（Texas）州建設新村；英國「烏托邦派」社會主義家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1825 年在美國恩戴納（Indiana）州集合同志組成新村，1826 年並製成憲法；法國「烏托邦派」福利埃（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建設「同居舍」（Phalanstère），這種藉個人的能力或同志的能力，來達到改造經濟組織的目的；或由少數人自由集合，獨立於政治的勢力之外，來改善一部分人心；或想離開舊社會創造新社會，故先從新社會下手，丟開舊社會不問，僅是一種「聊以自慰」的方法，並不是改造社會的正規；最終不能成功，不是理想太高，而是「方法不善」。亦即在「舊社會」必然要走向「新社會」的思維下，「新村派」以「離開舊社會創造新社會」，丟開舊社會不問的方法不妥，故而主張應當如「科學的社會主義家」注重「實際上的社會改革」，從破壞舊社會入手以走向新社會。⁹³

五四時期新／舊社會交鋒主要圍繞在該如何從「舊社會」走向「新社會」，分別提出「進化」與「革命」兩種主張，但知識人大多仍主張以「革命」方式推進從「舊社會」向「新社會」的發展。可見，在「社

⁹² 周佛海，〈從資本主義組織到社會主義組織兩條路——進化與革命〉，《新青年》第 9 卷第 2 號（1921 年 6 月 1 日），頁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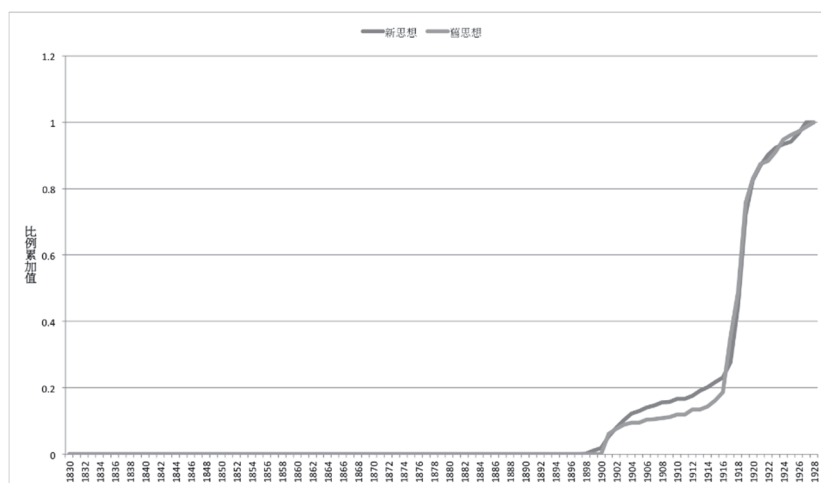
⁹³ 高一涵，〈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新青年》第 9 卷第 2 號（1921 年 6 月 1 日），頁 1-11。

會」概念層次上的新／舊交鋒，主要作用係作為革命論式的話語策略，以賦予革命的正當性與合法化，如此一來可在「新社會」填入理想的新思想與新道德、新制度，伴隨著必然要走向新社會的理念，這些被填入的新思想、新道德、新制度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可見在「新」的論述主題中，不同層面的新／舊論述具有不同的功能與意涵。

（三）先後同步交鋒：思想

新舊交鋒與激辯主題發展的第三種類型為「先後同步交鋒」，此一類型主要以「思想」概念為主，以下即從新／舊思想交鋒的主題數據結構與史料進行論析。

「思想」一詞是中國傳統既有的詞彙與概念，大致有兩種意涵：其一，思念、懷念；其二，想法、念頭。近代中國的「思想」概念，伴隨著西方精神科學傳入的現代化轉型，意指思維的結果或認知的心理歷程。則近代中國「思想」概念的現代化轉型的論述為何？近代中國新／舊思想的交鋒，所攻擊的舊思想與所提倡新思想為何？新／舊思想交鋒的發展軌跡如何？下文嘗試從巨觀方式遠讀數據結構出發，與前述的定性分析進行對話與補充，結合前述圖四、五「新／舊思想」的歷年比例累加值曲線，繪製成圖十一。



圖十一：「新／舊思想」關鍵詞歷年使用詞頻比例累加圖⁹⁴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從圖十一可見新／舊思想概念同步起於 1899-1901 年庚子事變後，但並未直接激辯交鋒，至多如 1902 年〈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將歐洲舊思想、中國舊思想與歐洲新思想列表比較之，並以君主專制為「舊思想」，以民族主義為「新思想」。⁹⁵ 顯示當時梁啟超在「思想」層次上出現革命意識，但並未作出強烈的革命論式的二元對立論述。梁啟超在「政府」面向不用新舊論式，但「思想」則用，主要在於其不願攻擊滿清政府故不提「舊政府」，但指摘傳統中的君主專制為「舊思想」，卻可藉以推進「君主立憲」的新制度與新政府，這正是在政府與思想兩面向上，梁啟超選擇不同論述模式的關鍵所在。

1902-1916 年，新／舊思想交鋒淡化，迨至 1917 年後新／舊思想開始大量同步湧現，且一開始是「舊思想」湧現勝於「新思想」，則

⁹⁴ 已減去新舊共出詞頻。

⁹⁵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新民叢報》第 10 號（1902 年 6 月 20 日），頁 20-34。

在 1917 年後新／舊思想交鋒的議題與目的為何？與晚清之際有何異同？

基本上，五四時期的新／舊思想論述是與新／舊道德、新／舊文藝結合。五四時期新舊論式由於激進化、主義化、意識形態化的趨勢，也出現泛化並互通的現象，正如 1919 年〈破壞〉指出：「新道德與舊道德，新思想與舊思想，新文藝與舊文藝，同時佔據同一空間，不把一種除去，別一種如何進來？」⁹⁶ 新／舊思想在五四之際被提出，更直接的原因是民初知識人在「新政府」成立後卻未見安定之下，而產生政治革命失能的質疑，認為問題不在「政治革命」，而轉向於「思想革命」，因此開始出現新／舊思想的革命論式之激辯，透過改變思想以改善政治，如 1919 年〈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指出：「現在所謂中華民國者，真是滑稽的組織；到了今日，政治上已成『水窮山盡』的地步了。其所以『水窮山盡』的緣故，想由於思想不變，政體變了，以舊思想運用新政體，自然弄得不成一件事。」⁹⁷

然而，要進行思想革命，須先知道何謂「思想」；但「思想」抽象，也難以區分新舊。正如傅斯年（1896-1950）1919 年〈隨感錄：（六七）中國狗和中國人〉指出即使自己與別人都認為他具有新思想，但他知道自己思想中還是有很多舊的思想存在，他認為自己是知道新思想可貴的人，也不是徹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舊思想的人，甚至他說：「我不曾見過一個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舊思想的人。」⁹⁸ 在「思想」層面上進行革命本來就較難以推展，除傅斯年指出透過「改造習慣」以建立新思想外，民初知識人主要連結到可施力的「文學」場域以實

⁹⁶ 孟真（傅斯年），〈破壞〉，《新潮》第 1 卷第 2 號（1919 年 2 月 1 日），頁 349。

⁹⁷ 傅斯年，〈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新潮》第 1 卷第 5 號（1919 年 5 月 1 日），頁 917-918。

⁹⁸ 孟真（傅斯年），〈隨感錄：（六七）中國狗和中國人〉，《新青年》第 6 卷第 6 號（1919 年 11 月 1 日），頁 636-637。

踐「思想革命」。

基本上「新／舊思想」與「新／舊文學」的論述，在五四時期密切綰結，知識人找到以「文學」作為思想革命的實踐場。如 1919 年〈非「折中派的文學」〉指出：「文學家的職任，本來不干預政治的？惟對於舊思想舊主義須破壞，新思想新主義須建設：這是他的最大職任。所以文學家大都主張新的。」⁹⁹ 明白揭示出思想革命是從文學革命加以落實與實踐，破壞舊思想舊主義，建設新思想新主義是文學家的職任，體現出新思想與新文學之間的密切關係。

綜觀近代中國「思想」層面的新／舊交鋒，不同於「新／舊政府」、「新／舊制度」、「新／舊社會」等直接進行二元對抗的論述，而是呈現出比較迂迴與調和的論述形式，這或許是因「思想」與「道德」抽象，難以明確分割劃清，故而難以樹立革命論式的新舊對立論，而多傾向於調和論或並立論，如 1919 年〈新舊思潮之激戰〉指出宇宙進化仰賴新舊思潮相互推演，缺一不可，而新舊必須並存且不斷交鋒激辯，真理才會出現。¹⁰⁰ 可知新舊「調和論」較多用於「思想」與「道德」層面上，也獲得較多的肯定；若在「政府」或「制度」層面上，則傾向於「革命論式」的「取代論」。

不過，當然也有人主張革命論式的新舊取代論述，藉以避免調和論傷害革命意志與力道，如陳獨秀 1920 年〈隨感錄：（八三）解放〉指出新思想與舊思想呈現為「壓制／解放」的關係，¹⁰¹ 故主張取代論，藉以強化革命行動的正當性。到了 1924 年後新／舊思想更為激進化，連結馬克思主義之後，新／舊思想的論述也走向社會主義傾向，如〈告勞動平民和青年學生！〉指出工人與學生應當起而反抗軍

⁹⁹ 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學」〉，《新青年》第 6 卷第 4 號（1919 年 4 月 15 日），頁 383。

¹⁰⁰ 守常（李大釗），〈新舊思潮之激戰〉，《每週評論》第 4 版，1919 年 3 月 9 日。

¹⁰¹ 獨秀（陳獨秀），〈隨感錄：（八三）解放〉，《新青年》第 7 卷第 2 號（1920 年 1 月 1 日），頁 160-161。

閥所竭力擁護的舊思想與復古行動，這些舊思想是讓中國退化，並受外國帝國主義剝削的關鍵，學生應當起而與工人、農民追求中國政治、經濟、思想上的解放。¹⁰²

（四）同步交鋒：文學

新舊交鋒與激辯主題發展的第四種類型為「同步交鋒」，此一類型主要以「文學」概念為主，以下從新／舊文學交鋒的主題面向數據結構與史料進行分析與討論。

「文學」概念隨著時代隨著歷史家隨著文論家隨著中西文化的交會，有其複雜的多重緣起及定義紛陳，涵義縮展不一的生命史。漢代「文學」取得職官地位，「方伎」一部分知識又滲合於文學原有的知識中，使原來文學的內容擴充又複雜。東漢末年文學脫離經術而獨立，專以寫作辭章之事為文學，文學涵義轉而縮小。中古時期文學的自覺，看重文學作品心理的要素，且將語言文字的符號和音律作用視為心靈表現的外在事實，已揭示「文學」的純粹性特質，接近於近代西方所確立的文學定義。但中國長期仍混用「文」或「文章」、「學」或「文學」、「學術」。近代以來，「文學」一詞因打破傳統一字一義的「組詞」習慣的轉變，及西方與日本的影響，涵義上也有若干轉變。¹⁰³ 誠如李奭學指出晚明西方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職方外紀》東傳，以「文藝之學」指稱內容包含各種詩文與議論文章的「文學」概念；接續耶穌會士與新教傳教士對「文學」概念的確立發揮了創造性轉化。1635年所刊刻的楊廷筠（1562-1627）《代疑續篇》改「文藝之學」為「文學」二字，擺脫《論語》以來孔門經籍或教育修身的概念，後經魏源（1794-1857）《海國圖志》、維新派人士如梁啟超與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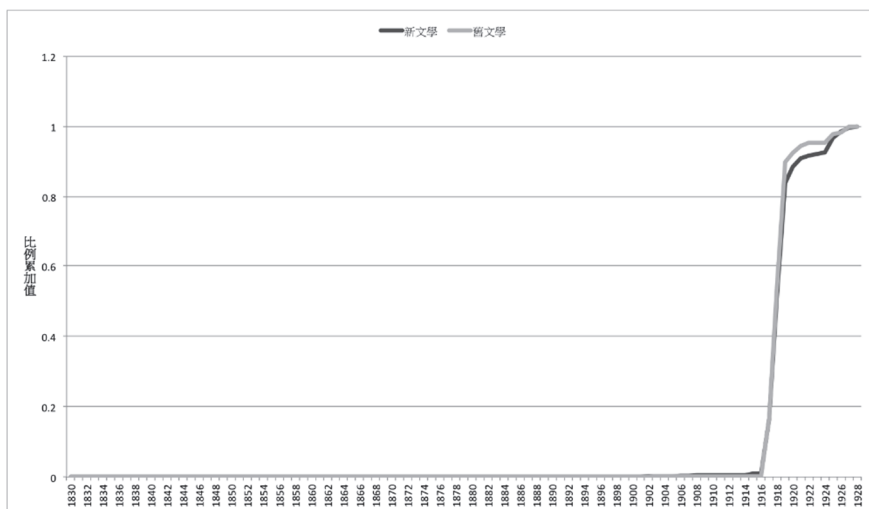
¹⁰² 〈告勞動平民和青年學生！〉，《嚮導》第67期（1924年5月28日），頁533-534。

¹⁰³ 王夢鷗，《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頁1-13。

維(1877-1927)等人的援用,而漸成具現代意義「文學」概念。¹⁰⁴而日本「文學」一詞,本借用中國古代的涵義與用法,到明治維新(1868-1912)之後,用「文學」逐譯西文「literature」一字而成為新詞語,且由於引入歐美大學學科體系及隨著日本大學教育制度的確立,無形之中也對「文學」概念的形塑起了推動的作用。近代中國知識人藉由西——日——中文化的互動與交流,完成「文學」概念的現代化轉型。現代化後的「文學」概念是世界共同的,近代中國知識人體認到「文學」除具有推動改革的作用外,也可使中國進入世界語境,重新成為世界之一員;一方面透過文學革命,去除高層文學和民間文學之別,提高古代小說、翻譯小說、戲曲傳奇的地位,一方面從理論上清理文學作品中的思想,並展開文學理論的討論,以與世界接軌。綜上可見「文學」概念在近代中國複雜的發展軌跡與特殊的歷史意義。¹⁰⁵則「文學」概念現代化轉型的論述為何?近代中國新/舊文學的交鋒,所攻擊的舊文學與所提倡的新文學為何?新/舊文學交鋒的發展軌跡如何?當「文學」概念連結上「新/舊論式」所涵具的歷史意涵為何?下文嘗試從巨觀視野遠讀數據結構出發,與前述的定性分析進行對話與補充,結合前述圖四、五的「新/舊文學」的歷年比例累加值曲線,繪製成圖十二。

¹⁰⁴ 李爽學,〈八方風雨會「文學」〉,《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0期(2016年6月),頁151-177;李爽學,〈晚明翻譯與清末文學新知的建構——有關《釋述:明末天主教翻譯文學論》的一些補充〉,《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1卷第1期(2011年3月),頁216-228。

¹⁰⁵ 有關「文學」概念之形成與發展,另可參〔美〕劉禾(Lydia H. Liu)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頁48、380;蔡祝青,〈文學觀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頁273-333;方維規,〈西方「文學」概念考略及訂誤〉,《讀書》2014年第5期,頁9-15;鍾少華,〈中文「文學」概念史〉,《中文概念史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2年),頁33-51;余來明,《「文學」概念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



圖十二：「新／舊文學」關鍵詞歷年使用詞頻比例累加圖¹⁰⁶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統計與製圖

從圖十二可見，「文學」概念在新／舊論述交鋒中，自 1917 年才開始被關注而同步交鋒湧現。晚清之際所揭舉的小說革命、詩界革命等，為中國文學增大新思想、新語言、新作品，但卻沒有提出「新文學」概念，直至 1916 年胡適〈文學改良芻議〉（1916）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中，才出現「文學革命」，以及「新文學」概念。¹⁰⁷正因民初知識人最終發現政治改革要透過思想改革完成，而思想改革必須透過文學改革才能落實，因此「文學」主題迨至 1917 年才呈現新／舊的交鋒與激辯。且新／舊文學的論爭，實際上不僅止於文學，也牽涉到精神文明，因而難以呈現出革命論式的新／舊文學對抗論述，如同 1918 年王敬軒（錢玄同化名，1887-1939）指出新／舊文學

¹⁰⁶ 已減去新舊共出詞頻。

¹⁰⁷ 鍾少華，〈中文「文學」概念史〉，《中文概念史論》，頁 44。

不一定是取代，若是「得新忘舊」乃「蕩婦所為」。¹⁰⁸

1919年羅家倫（1897-1969）〈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定義「文學」的概念內涵為：「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從最好的思想裏寫下來的，有想像，有感情，有體裁，有合於藝術的組織；集此衆長，能使人類普遍心理，都覺得他是極明瞭、極有趣的東西。」因西洋文學具有切於人生、喚起人類同情、求真相、平民與天然的、發展個性的等特點，¹⁰⁹與所定義與申明的「文學」概念內涵一致，故認為西洋文學是好的文學形式，而不同於中國文學。羅家倫不談新／舊文學而論中／西文學，中／西文學轉為論爭的焦點。

1919年〈白話文的價值〉以「一代自有一代的文學」的立場肯定以白話文寫作的「新文學」，並從文學的作用出發，認為文學最大作用為「描寫現代的社會，指導現代的人生」，而這兩個作用只有用現代語言才能達致，因而主張以「新文學」取代「舊文學」。¹¹⁰又如1919年〈論新舊〉從「適用」角度判斷新舊文學的關係與價值，文中認為新舊並非絕對，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精神，現代的時代精神與從前的精神既不相同，形式也應改觀，故稱為「新」，但若過去的時代精神又重被提出作為現代的時代精神，也可稱為「新」。¹¹¹以「適用」作為「新文學」之「新」的標準與內涵，「新」意指「適用」，而非具有善惡價值判斷，正因新舊並非絕對，因而，舊文學不一定要全盤推翻，民初知識人藉此以解套舊文學中仍具價值的悖論。

1919年胡適〈新思潮的意義〉則對新／舊交鋒提出看法，他不再實質的定義「新」的內容，而是將「新」的內涵變成一種思考方式，

¹⁰⁸ 王敬軒（錢玄同）、記者（半農）（劉半農），〈文學革命之反響：王敬軒君來信〉，《新青年》第4卷第3號（1918年3月15日），頁265-285。

¹⁰⁹ 羅家倫，〈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頁194-195。

¹¹⁰ 朱希祖，〈白話文的價值〉，《新青年》第6卷第4號（1919年4月15日），頁361。

¹¹¹ 潘力山，〈論新舊〉，《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頁109-113。

即以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精神定義「新」是一種「評判的態度」，因此「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這正是新思潮運動的精神。¹¹²這也可視為一種對革命論式的新／舊文學論述的鬆動。可見，「新文學」的提出或許只是為了與「舊傳統」區別，這才是民初知識人的關切重點。如鍾少華指出《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中當年文學論爭都聚焦在討論何謂「新文學」，如周作人（1885-1967）以「人的文學」作為「新文學」概念，而鄭振鐸（1898-1958）則認為「新舊」不是評價標準，而是指明正路的路牌，稱某某體的文藝為舊的文藝，表示文體已陳舊，不合於現代人，稱某某體的文藝為新的文藝，表示該文體是新鮮，尚待大作家去運用。¹¹³可見近代中國新／舊文學的論述，不是革命二元對立意識下的結果，新／舊文學多非取代關係，而是指明正路與適用與否。「新文學」的提出是為了區別於「舊傳統」，到底什麼是「新文學」實質上並非主要重點。換言之，近代中國「新／舊文學」激辯所帶出的不是文學革命，而是形諸文學中的思想與傳統革命。

四、結論：新／舊交鋒與激辯中的中國現代性

由前文分析可見，七個主題的新／舊交鋒當可視為一個有機組合體，彼此之間具有層層遞進與相互配合的關係。首先在層層遞進關係之上，七個新／舊交鋒主題在時間序列上有層層遞進現象，有一從新／舊政府激辯，走向新／舊制度、新／舊社會、新／舊道德、新／舊思想、新／舊勢力，最後走向新／舊文學交鋒的論述發展過程，而此

¹¹²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頁5-12。

¹¹³ 鍾少華，〈中文「文學」概念史〉，《中文概念史論》，頁45-46。

一過程正是近代中國從政治革命出發，發現政治革命的關鍵應在思想革命，再發現思想革命的關鍵應在文學革命的自覺之路的語言證據。其次在相互配合關係上，如「新／舊文學」的提出是為了進行「新／舊思想」與「新／舊道德」的革命工作，而「新／舊社會」與「新／舊制度」的提出，是為了建造一個能讓「新思想」與「新道德」誕生的環境。通過巨觀視野與遠讀方式可見近代中國新／舊論述呈現為一有機的整體，既可勾勒出新／舊論述的宏大架構，也可揭示近代中國新舊交鋒與激辯的歷史脈絡與主題結構。

以下根據本文數位人文研究結果，提出三點考察，藉以驗證、修正傳統人文學者定性研究的舊說，並提出巨觀視野下數位人文研究的新看法。

（一）舊的代謝

從本文研究可見，時至民初，知識人已從新／舊論爭中發現，今日的「新」就是明日的「舊」，而革命論式下的新／舊論爭會不斷摧毀原有的基礎與秩序，而重新創建新的社會秩序後，又將於明日被摧毀，如此將使得革命論式的新／舊論爭成為一種危險的論述。或許近代知識人正因意識到新／舊交鋒論述容易陷入革命論式的危險性，最終放棄了樹立「舊的敵人」，不再使用「新舊論式」談「新與舊爭」，而是如羅志田指出從「新新論式」出發談「新與新爭」，¹¹⁴ 借此護存既有根基，又能有所改變與成長，這符合後來歷史發展中不再需要「革命之新」，更為需要的是「建設之新」的歷史走向。正是伴隨上述歷史發展的傾向，使得「新舊交鋒」轉為「新新交鋒」，「舊」的論

¹¹⁴ 羅志田指出在新文化運動最後一次顯著的新舊之爭後，從此基本都是新與新的思想論戰，舊派已大致失語。參見羅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思想與社會的權勢轉移〉，《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頁5。

述逐漸在歷史舞臺上落幕，從而呈現出「舊的代謝」的現象。

（二）新的失能

綜觀近代中國百年來的新／舊交鋒論述，實質表徵著現代性容納著各種不同的價值等級體系。但在容納著各種不同的價值等級體系的同時，一場場合法化／解合法化的論述不斷輪番上陣，激烈交鋒。誠如阿格尼絲·赫勒（Heller Ágnes, 1929-2019）所言：「由於對現存事物說『不』的解合法化姿態，以及對尚未存在的事物說『是』的合法化姿態，已經成為現代的日常事務，由於現代性沒有被否定所毀滅而是因否定而繁榮這一點已經被接受，每一個公民在原則上都可以參與合法化／解合法化的過程。」¹¹⁵ 的確近代中國百年來的新／舊交鋒論述包蘊在一個層層否定的結構中，對既存事物說「不」以解合法化，對尚未存在事物說「是」以取得合法化；為了使「新」取得「是」的合法化地位或正當化論據，往往以「否定」的修辭邏輯說「不」，以對「舊」解合法化，由此晚清的「新」成了民初的「舊」。但新／舊概念本非對立，而是相對比較而成立，且又不斷游走於概念的光譜學之內與之外而模糊難分，不易確鑿或固著。當一味的追求「新」，且以二元對立態度去「崇新」時，就只會造成不斷的「破壞」而無法積累，如同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十九世紀以來，『新』成為鑑定作品是否現代的標識；一旦更新風格的作品出現，『新』，就不新、就落伍了。」¹¹⁶ 或是馬歇爾·伯曼（Marshall Berman, 1940-2013）借用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話：「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來指明所謂「現代性」，「它將我們所有的人都倒進了一個

¹¹⁵ [匈]阿格尼絲·赫勒著，李瑞華譯，《現代性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292。

¹¹⁶ [德]哈伯瑪斯著，張錦忠、曾麗玲譯，〈現代性——未竟之功〉，《中外文學》第24卷第2期（1995年7月），頁5。

不斷崩潰與更新、鬥爭與衝突、模稜兩可與痛苦的大漩渦。」¹¹⁷也因一味的「求新」，一味的「崇新」，而造成對既有的不斷的崩潰、破壞，而引發鬥爭與衝突，這對於建設發展並非好事，正因如此當時知識人對民初文化失範的亂象發出諸多警告。因此所謂的「新」，實不應為「革命的新」，應當是可融合「舊」之下的「建設的新」，如此才能在既有積累之上再求新的發展。

誠如羅志田指出近代中國崇新的直接後果，就是不斷地追求進一步的新，並且不斷地破舊以證明及維持其新，然而新舊是相對的，當不斷崇新就不能產生可接受的持續象徵，進而造成中間主幹之位空虛的問題。¹¹⁸也正因「革命的新」的湧現，造成了「文化失範」的困局，因所有的「範式」都不斷的在「革命的新」中被推倒。長久以往，不僅傳統思想無法解決現實問題而產生「舊的失能」導致「舊的代謝」；在「革命的新」的思潮中，「革命的新」不斷的進行革新，則「新」就在不斷革新中不斷的「失能」，因而近代中國也呈現出「新的失能」的現象。正因「革命式的新」會導致「新的失能」，故須回到「建設式的新」才能有所發展，透過細微的修改，與舊的信仰與命題鑲嵌，進而形成一個全新的結構形態，才能使「新」既能維持一定的秩序，又能配合時代語境改變而有所開創、變化與發展。

（三）概念的「二重現代」轉化

本文透過巨量數據資料的歷時性發展結構，揭示了中國晚清至民初概念的「二重現代」轉化的語言證據及過程脈絡與歷史內涵。晚清

¹¹⁷ [美]馬歇爾·伯曼著，徐大建、張輯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體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5。

¹¹⁸ 羅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思想與社會的權勢轉移〉，《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頁36。

之際，各種概念受到西學與東學影響，在與西學／東學概念的對話融通過程中，完成了概念的第一重現代轉化的文化工程；而經過一重轉化後的現代化概念，在歷經清末至民初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的劇烈改變，又再次意識到晚清之際的現代轉化是中西交混，必須再進行一次全盤西化的現代化文化改造工程，從而形成概念的「二重現代」轉化。從這可推進與深化「新的崇拜」的論述，由於「新的崇拜」的過程具有二重性，因此近代中國現代性並非是一元的，誠如羅榮渠（1927-1996）所言：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有一從「簡單、一元結構、功能普泛化」朝向「複雜、多元、功能專一」的發展趨勢。¹¹⁹ 從本文揭示的長時段新舊交鋒七概念主題的變化過程中，當可證明近代中國確實具有概念「二重現代」轉化的發展軌跡。而這也是中國現代性的一個顯著特徵。

本文透過數位人文技術輔以微觀分析，重新抉發出近代中國新／舊論爭的歷時性發展軌跡，除驗證與修正過去前人的研究成果外，也在數位技術的複雜計算視野下提出了新／舊論爭實具有不同步性結構的新的研究成果，此一考察結果唯有透過數位人文視野方能發現並加以描摹、勾勒，正體現出數位人文研究方法的創新性與價值所在。

（責任校對：林琬紫）

¹¹⁹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50。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南朝宋〕劉義慶著，〔明〕何良俊增補，〔明〕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
- 〔唐〕李延壽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
- 〔宋〕朱熹編，《近思錄》，臺北：金楓出版，1997年。
- 〔南宋〕作者不詳，黎烈文標點，《大宋宣和遺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
-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二、近人論著

- 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二十一世紀》總第111期，2009年2月，頁124-131。
- _____，〈概念史八論——一門顯學的理論與實踐及其爭議與影響〉，《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101-170。
- _____，〈西方「文學」概念考略及訂誤〉，《讀書》2014年第5期，頁9-15。
- 毛澤東，〈學生之工作〉，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頁449-457；原刊於《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號，1919年12月1日。

- 王中江，《近代中國思維方式演變的趨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 王先明，〈近代「新學」的民族定位〉，《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57-284。
- 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會」論——從兩份未刊殘稿談起〉，收入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550-562；原刊於《中國文化》1996年第14期，頁203-212。
- 王雲紅，〈「勢力範圍」概念考釋〉，《蘭州學刊》2007年第1期，頁178-181。
- _____，〈「勢力範圍：一個概念在近代中國的形成與發展〉，《重慶社會科學》2007年第10期，頁67-73。
- 王夢鷗，《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
- 丘為君，《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
- 左玉河，〈晚清「古學復興」：中國舊學納入近代新知體系之嘗試〉，《史學月刊》2004年第9期，頁62-71。
- 余來明，《「文學」概念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
- 李萍，〈日本近代「道德」、「倫理」概念的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頁77-82。
- 李爽學，〈晚明翻譯與清末文學新知的建構——有關《釋述：明末天主教翻譯文學論》的一些補充〉，《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1卷第1期，2011年3月，頁205-242。
- _____，〈八方風雨會「文學」〉，《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0期，2016年6月，頁151-177。
- 李雙元、黃惠康主編，《國際法》，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2000年。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____，〈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收入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511-549。

____，〈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55-84。

段煉，《世俗時代的意義探詢——五四啟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觀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12年。

倪憐襄，〈制度概念釋義〉，《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頁589-592。

凌鵬，〈中國傳統「制度」概念中的「制度精神」與「史實現象」——以西周「世卿制度」為例〉，《社會發展研究》2016年第3期，頁85-107、243-244。

徐曼，《西方倫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

康有為著，湯志鈞編，〈致各埠保皇會公函〉，《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冊上，卷2，頁413-414。

____，〈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冊下，卷3，頁842-849。

陳力衛，〈詞源（二則）：社會〉，收入孫江、劉建輝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1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4月，頁194-206。

陳旭麓，〈戊戌時期維新派的社會觀——群學〉，《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頁161-175。

陳瑋芬，〈「倫理」、「道德」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轉化與再生——與近代中國的比較〉，收入李明輝、邱黃海主編，《理解、詮釋與儒家傳

統：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年，頁231-272。

陳獨秀，《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朝樂門、邢春曉、張勇，〈數據科學研究的現狀與趨勢〉，《計算機科學》2018年第1期，頁1-13。

無卯（章士釗）著，章含之、白吉庵主編，〈迷而不復〉，《章士釗全集（1914.5.10—1916.1.10）》，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卷3，頁226-230；原刊於《甲寅》第1卷第3號，1914年8月10日。

黃興濤，〈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代性」問題——兼論「思想現代性」與現代性「社會」概念的中國認同〉，《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頁128-136。

憤民，〈論道德〉，收入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卷3，頁847-853；原刊於《克復學報》第2、3期，1911年8、9月。

蔡祝青，〈文學觀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頁273-333。

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223-302。

鄭文惠、邱偉雲，〈從「概念」到「概念群」：《新民叢報》「國家」與「教育」觀念的互動與形塑〉，《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0期，2016年6月，頁37-102。

鍾少華，〈中文「文學」概念史〉，《中文概念史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2年，頁33-51。

羅志田，〈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歷史研究》1995年第5期，頁117-132。

_____,〈近代湖南區域文化與戊戌新舊之爭〉,《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頁51-81。

_____,〈思想觀念與社會角色的錯位：戊戌前後湖南新舊之爭再思——側重王先謙與葉德輝〉,《歷史研究》1998年第5期,頁56-76。

_____,《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_____,〈新舊能否兩立：二十年代《小說月報》對於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頁9-28、189。

_____,《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日〕木村直惠著,顧長江譯,〈「社會」概念翻譯始末——明治日本的社會概念與社會想像〉,收入孫江、陳力衛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2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頁138-153。

〔匈〕阿格尼絲·赫勒(Heller Ágnes)著,李瑞華譯,《現代性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美〕馬歇爾·伯曼(Marshall Berman)著,徐大建、張輯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體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美〕劉禾(Lydia H. Liu)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

〔美〕戴安德(Anatoly Detwyler)著,姜文濤、趙薇譯,〈數字人文作為一種方法：西方研究現狀及展望〉,《山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

11 期，頁 26-33。

〔英〕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著，嚴復譯，《天演論上・導言十八・新反》，收入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冊 5，頁 1357-1360。

〔德〕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著，張錦忠、曾麗玲譯，〈現代性——未竟之功〉，《中外文學》第 24 卷第 2 期，1995 年 7 月，頁 4-14。

〔德〕馮凱（Kai Vogelsang）著，朱聯璧譯，〈中國「社會」：一個擾人概念的歷史〉，收入孫江、陳力衛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 2 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年，頁 99-137。

Altman, Douglas G. *Practical Statistics for Medical Research*. Boca Raton: Taylor & Francis, 1991.

Jockers, Matthew L. *Macroanalysis: 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 History*. Urbana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3.

Koselleck, Reinhart. "Begriffs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 *Economy and Society* 11/4 (1982): 409-427.

Skinner, Quent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Underwood, Ted. *Why Literary Periods Mattered: Historical Contrast and the Prestige of English Stud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三、報刊文獻

〈記橫濱華商會議事〉，《清議報》，1900 年 7 月 7 日，收入梁啟超、馮鏡如等編輯，《清議報》，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橫濱清議報館，冊 7，第五十冊，頁 3277-3278。

〈教育與群治之關係〉，《湖北學生界》第 4 期，1903 年 4 月 27 日，

頁 15-23。

〈民族主義之教育〉，《遊學譯編》第 10 冊，1903 年 9 月 6 日，頁 1-9。

〈論日俄戰後歐洲之國際・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九月十日《外交時報》〉，《外交報》第 5 卷第 23 號，1905 年 10 月 3 日，頁 12-13。

〈論亞洲諸國之將興・譯英國一千九百五年九月九日《哈羅報》〉，《外交報》第 5 卷第 28 號，1905 年 11 月 21 日，頁 7-8。

〈告勞動平民和青年學生！〉，《嚮導》第 67 期，1924 年 5 月 28 日，頁 533-534。

大我，〈新社會之理論〉，《浙江潮》第 8 期，1903 年 10 月 10 日，頁 9-21。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新民叢報》第 1 號，1902 年 2 月 8 日，頁 11-17。

_____，〈新民說一〉，《新民叢報》第 1 號，1902 年 2 月 8 日，頁 1-10。

_____，〈新民說三〉，《新民叢報》第 3 號，1902 年 3 月 10 日，頁 1-7。

_____，〈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新民叢報》第 10 號，1902 年 6 月 20 日，頁 20-34。

王敬軒（錢玄同）、記者（半農）（劉半農），〈文學革命之反響：王敬軒君來信〉，《新青年》第 4 卷第 3 號，1918 年 3 月 15 日，頁 265-285。

任公（梁啟超），〈過渡時代論〉，《清議報》，1901 年 6 月 26 日，收入梁啟超、馮鏡如等編輯，《清議報》，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橫濱清議報館，冊 10，第八十三冊，頁 5283-5290。

守常（李大釗），〈新舊思潮之激戰〉，《每週評論》第 4 版，1919 年 3 月 9 日。

- 朱希祖，〈白話文的價值〉，《新青年》第6卷第4號，1919年4月15日，頁359-364。
- ，〈非「折中派的文學」〉，《新青年》第6卷第4號，1919年4月15日，頁382-384。
- 余家菊，〈什麼是革命的最好方法〉，《少年中國》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頁35-40。
- 吳康，〈論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頁329-335。
- 吳樾君，〈烈士吳樾君意見書〉，《民報》第3號，1906年4月5日，頁1-9。
- 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新潮》第2卷第2號，1919年12月1日，頁207-224。
- 李璜，〈破壞與建設及其預備工夫〉，《少年中國》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頁30-36。
- 汪叔潛，〈新舊問題〉，《新青年》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頁1-4。
- 周佛海，〈從資本主義組織到社會主義組織兩條路——進化與革命〉，《新青年》第9卷第2號，1921年6月1日，頁1-9。
- 孟真（傅斯年），〈破壞〉，《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頁348-350。
- ，〈隨感錄：（六七）中國狗和中國人〉，《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月1日，頁635-637。
- 沼胡，〈教育私議〉，《江蘇》第5期，1903年8月23日，頁35-43。
- 俞平伯，〈我的道德談〉，《新潮》第1卷第5號，1919年5月1日，頁883-895。
- 秋桐（章士釗），〈政力向背論〉，《甲寅》第1卷第3號，1914年7月10日，頁1-23。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頁5-12。

_____，〈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號，1920年4月1日，頁467-477。

_____，〈編輯後記〉，《獨立評論》第142號，1935年3月17日，頁24。

飛生（蔣百里），〈國魂篇（續第一期）〉，《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頁19-30。

兼士（沈兼士），〈國民生存之大問題〉，《大中華》第1卷第8期，1915年8月20日，頁1-9。

高一涵，〈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新青年》第9卷第2號，1921年6月1日，頁1-11。

高硯石，〈生存競爭與道德〉，《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頁1-6。

陳啓天，〈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頁2-5。

陳達材，〈社會改制問題〉，《新潮》第2卷第1號，1919年10月30日，頁23-28。

陳獨秀，〈調和論與舊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頁116-118。

陶履恭，〈新青年之新道德〉，《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15日，頁94-98。

傅斯年，〈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號，1919年5月1日，頁913-919。

飲冰（梁啟超），〈所謂大隈主義〉，《新民叢報》第3年第9號（原第57號），1904年11月21日，頁60-73。

_____，〈現政府與革命黨（附記俄羅斯現政府與革命黨）〉，《新民叢

報》第4年第17號（原第89號），1906年10月18日，頁23-34。

新凱，〈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錄《覺悟》）〉，《新青年》第9卷第5號，1921年9月1日，頁1-7。

漢駒，〈新政府之建設〉，《江蘇》第5期，1903年8月23日，頁17-33。

歐陽仲濤，〈國人之一念〉，《大中華》第2卷第3期，1916年3月20日，頁1-10。

潘力山，〈論新舊〉，《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頁109-113。

獨秀（陳獨秀），〈隨感錄：（八三）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1日，頁160-161。

磬心，〈中國新教育案〉，《新民叢報》第5號，1902年4月8日，頁47-55。

羅家倫，〈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頁185-196。

觀雲（蔣觀雲），〈辨論與受用（續第六十五號）〉，《新民叢報》第3年第18號（原第66號），1905年4月5日，頁1-10。

〔日〕河上肇著，淵泉（李大釗）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錄《晨報》）〉，《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15日，頁509-516。

〔英〕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著，張崧年（張申府）譯，〈民主與革命：續前〉，《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1月1日，頁1-6。

四、電子資料庫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國立政治大學高教深耕「東亞文化傳統及其現代轉型」國際拔尖計畫（主持人：金觀濤、鄭文惠）進一步發展完善，並提供檢索服務。

“New/Old” Discursive Confrontations and Debates over Modern China under the Scope of Digital Humanities

Wen-Huei Cheng*, Wei-Yun Chiu**

Abstract

The issue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in China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subject that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the humanities. Scholars from various fields have accumulated a considerable body of research in their respective disciplines. Based up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digital humanities, focusing on the keyword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word family “new/ol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Employing the techniques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huge group of vocabulary that appeared in modern China with “new/old” as the prefix, and discovers seven themes in the “new/old” discursive confrontations from these vocabularies that occurred ove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y are: new and old society, new and old government, new and old ideas, new and old morality, new and old forces, new and old systems, and new and old literature. Calculating data about the temporal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rector, 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Deputy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China

dimens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seven themes using time series analysis, we reveal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old/new” confrontations and debates over time. Finally, we propose three observations — “the supersession of the Old,” “the disablement of the New,” and “the ‘double modern’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 so as to verify and revise previou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provide new views based on digital humanitie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Key words: New-Old discursive arguments, Modern China, multiple modernities, digital humanities, the history of ideas